

燕 大 學 文 學 作 品 選

心理医生和他的女病人

原名《朱莉娅·帕瑞戴斯》

1912年·欧内斯特·欧内斯特

中国·北京出版

1912年·欧内斯特·欧内斯特

澳 大 利 亚 文 学 作 品 选

本书由澳大利亚文化委员会资助出版
本书根据企鹅出版公司版本译出

心理医生和 他的女病人

[澳] 罗德·琼斯 著 欧阳昱 译

主编 胡文仲 副主编 李书敏



中国·重庆出版社 ▲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医生和他的女病人/(澳大利亚)琼斯著;欧阳昱译. -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

ISBN 7-5366-4693-3

I.心… II.①琼… ②欧… III.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0256 号

本书根据澳大利亚 Penguin Book Australia Ltd 1989 年出版的

JULIA PARADISE

译 出

▲心理医生和他的女病人

(原名《朱莉娅·帕瑞戴斯》)

[澳大利亚]罗德·琼斯 著
欧阳昱 译

特约编辑 蒲 黎

责任编辑 陈小丽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刘忠凤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

字数 62 千 插页 5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66-4693-3/I·911

定价 9.00 元

“在不少病例中，特别是有关女病人和需要阐明情欲思绪的病例中，病人的合作成了一种个人牺牲，这种牺牲只有以某种爱情的替代物才能得到补偿……”

弗洛伊德：《歇斯底里的精神疗法》

“是的，蠢就蠢在想得出结论。我们是线，可我们却想知道整张布匹……”

福楼拜：《书信集》



1

几年来，一位名叫肯尼思·艾雅司——人称“蜜瓜”的苏格兰医生一直靠着租界区那些流亡国外的英国人，特别是在阿斯特王朝饭店逗留的游客赚钱度日。一个新来者很快就发现，原来艾雅司吸烟上瘾，他的烟斗中习惯装满了“蜜瓜”。“加拉赫的蜜瓜”。以后，他还可能会听见人们窃窃私语，说这种叫法还有一种更为邪恶的来源。

1927年春，艾雅司34岁。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倒还不光是因为他的外表。他身材魁梧，体重约250磅，很不舒适地裹在浆过的领子和蓝哔叽西装里。当他把一身大块头推出



俱乐部,又推往饭店时(他坐落在阿斯特王朝饭店三楼的公寓就设有诊室),艾雅司不得不经常气喘吁吁地时走时停,稍事休息。在上海下午的滚滚车流中,人力车夫得费很大的劲儿,才能把艾雅司笨重的躯体拉动。

你也许在上海俱乐部见过他,人家送了他一个临时会员资格,但他从来没有完全成为正式会员,会员期也从来没有完全到期作废过。在长酒吧一半的地方,即商行经理和主要职员之间那片定义不很明确的“专业”行列中,他占据了分配给他的位置。你也许曾发现他在楼上,坐在俱乐部一把很深的皮安乐椅里,一手端着白兰地,一手拿着烟斗,正与某个也许刚刚到达东方的年轻人在进行正餐之后的交谈。艾雅司除了身高个大之外,还有一点也使人印象深刻,那就是他很健谈。

他爱谈三样东西:一是爱丁堡市,他在那儿度过童年,上过大学。二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在他的指导下在维也纳学习了一年,而且由于艾雅司蓄了胡子,而跟弗洛伊德有几分相像。三是艾雅司爱谈他的同胞 J·M·巴利,此人的剧本《彼得·潘》在 1904 年戏剧季节首演之时,艾雅司还是个 11 岁的小男孩,他趁学校放假期间跟父亲在伦敦看过这出戏,而且一下子就爱上了戏里面演温蒂的那个女演员。(完全是顺便说一句,巴利 1930 年成为爱丁堡大学的校长。)

除了他自己的标准以外,用其他任何标准衡量,艾雅司都算是功成名就。他父亲是苏格兰的一个陆军上校,学校毕业后,他令父亲失望,拒绝参军,转而学医。他是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期间才第一次对治疗神经紊乱发生兴趣的。

他在赫里福德郡的一家军事医院度过了战争时期,治疗



患炮弹休克症的病人。他在医院的护士站认识了一位当地姑娘并跟她结了婚。战后，她那纯属赫里福德郡贵族阶层的家庭开始在该地为他寻找一家安稳的开业地点，可他身上喀里多利亚人特有的不安于现状的想法抬头了，于是，艾雅司和他年轻的妻子在欧洲大陆旅行了一段时间。开始时他还想回到医院继续治疗神经病人，不料却发现自己报名参加了弗洛伊德的研究生班，好像纯出偶然，毫不费力地在维也纳度过了一年。

艾雅司并非天才，但他是个有才气、很认真的学生。在弗洛伊德圈子里那些光彩夺目、学问领先的人面前，他相形失色，但即使庸才也有庸才的本命年——维也纳的这一年就是艾雅司的本命年。但是，在1919年的冬天，他受到西班牙流行感冒的影响。他妻子在维也纳得了病，他们回到英国时，她就死了。

整整三年，艾雅司为了忘掉悲伤，工作到精疲力竭的地步，但仍无法忘却，于是决定采取英国人常用的另一种缓和剂——买船票去了东方。他本来想乘船去澳大利亚悉尼市，但却心血来潮，在上海下了船，而且一直都呆在那儿。

艾雅司在上海一直有点像个局外人。他在跑马俱乐部和长酒吧消磨时光，但他所有的熟人中间却没有一个人算得上是朋友。社交上面，那儿的英国人虽对他彬彬有礼，态度恭顺，但其中夹杂着疑心。似乎他们对他们的秘密了解得够多了，因为他的预约本上记满了他们的妻子和女儿的名字，以及她们小病小痛的病例，歇斯底里，紧随恋爱破裂而来的精神崩溃等等，因此他们都倾向于排斥他。



他跟那些学中文,然后成为学者的英国人不一样。艾雅司最喜欢上海的一点就是那种过客般的感觉。当他坐在长酒吧或阿斯特王朝饭店的大厅时,艾雅司看着所有那些其他的外国人从他面前经过——那些英国女人,她们之中就连健康者也面色苍白,病恹恹的;那些冒险者,初出茅庐的画家和向人乞讨五美元钞票的作家;那些年轻而面生的美国传教士,他们好像希望靠着他们人多势众,就能在中国传播基督教。这里面有些人无聊得让人生厌。他们疲倦之极,却又盲目狂热,除了基督教和中国,其他一概不谈,句句话都不离这两个词。另一些人则怕得要死,这些新来者对大城市的唯一经历就是开航前在旧金山度过的那三天,此时,耳闻目睹眼前的八百万异教徒,他们突然觉得信仰脆弱得不堪一击了。他们手心冒汗,目光茫然,害怕脸上流露出恐惧。有时候,他们过了好几个月才重又出现,这时男人精神上已经垮了,女人则一个劲地说着疯话,堕落成了这个城市瓦砾堆中的一个部分,而且经常因吸毒上瘾而成为各种药物的牺牲品。

一个星期六下午的晚些时候,就有一位女性飞奔进阿斯特王朝饭店的这个前厅,她迟疑片刻,便转身消失在那扇仍在旋转的柏林门的玻璃隔板后面,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艾雅司刚好一眼瞥见了她的脸。她一眼看见了他,眼睛闪闪发光,眼神却好像迷失了方向。他发现前台服务员也注意到她了,可能还怀疑她是个妓女。这件事发生的时间不过一秒钟,绝不会超过一秒。就在艾雅司注意到她时,她已经在往外走了。

几分钟后,她又回来了。这一次,她紧紧抓住一位牧师绅士的胳膊。那人戴着一顶帽子,领子是赛璐珞的,身穿黑色西



装,手提自己的纸板箱,尽管一个搬运工空着双手,跟着他走进大门。那女人仍然慌慌张张,分不清东西南北。前台服务员,那个中国人,跟她说话时,她竟尖叫起来,用手摸她身后一张舒适的客厅沙发,一坐下来就睡着了,把前台服务员弄得莫名其妙。那位传教士先生脚跟在地上蹭着,怯生生地来到前台解释,仍紧紧抱着那只纸板箱不放。

艾雅司看着这一切,像平时一样虽感兴趣,但表面上装得无动于衷,却吃惊地看见前台服务员朝他这边指着,又见那位牧师迈着同样迟疑不决的步子,摘下帽子,拖着脚跟走上前来。

艾雅司估摸这人年约 50,他长得皮肤白皙,头发秃顶,一双淡蓝色的眼睛。从他谈话中,艾雅司明白,原来他名叫威利·帕瑞戴斯,在上海卫理公会教堂工作,根据他说话的土腔土调判断,他是澳大利亚人。

“我妻子,”他缓缓地说,“最近受了一点儿刺激。”

艾雅司似乎对他没有多大好感。他把抽完的雪茄烟蒂扔进铜痰盂里,掏出他的印花大手帕,从嘴角揩去一星唾沫,仔细检查了一下,重新把手帕放回兜里,就用手摸起他的烟斗来。

“恐怕她对事情过于激动了一点。”那人顿了顿,对艾雅司眨了眨眼。“倒不如说事情把她压倒了。她恐怕把她那捆东西完全弄丢了吧。”

艾雅司目光越过饭店前厅,看着那个在平静中熟睡的女人。她是个小个子,相貌平凡,难以归类,年龄无法确定,身穿一套黑色毛料西服。帕瑞戴斯牧师说:“你同意检查她的身体



吗？”艾雅司找到了他的烟斗，带着明显的厌恶查看着烟斗中污黑的烟油。

“你最好带她上楼来。看能不能先把她叫醒。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请几个伙计把她装进手推车里，坐行李电梯上楼。”

那位男子道歉说：“我妻子的病例把你之前的几个医生都给难住了。”他想了想后又补充道，“反正我也并不指望你能创造奇迹。”

艾雅司的房间在这座建筑物的三楼，由一座恶名昭著、很不可靠的电梯与地面相接，这座铁笼子就是工作时，也要在缆绳和滑轮上呻吟打颤。它是艾雅司生存中的灾星：他本人身体沉重，讨厌楼梯。今天这个星期六的下午，已经过了艾雅司通常喝茶的时间，电梯正在工作，可开电梯的人却哪儿都不见。他走过那座安了一扇滑动窗户的小木凹室，只见里面那男孩裹了一张毯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爬上通往电梯平台的三步梯级，拉开六角手风琴似的铁门，领着传教士和他的箱子进了电梯。门关上了，他转动了一下门把手。缆绳颤抖着，发出哀诉声，电梯开始上升。这时，艾雅司一眼瞥见两个搬运工正把昏迷不醒的小女人往一架小手推车上抬。

帕瑞戴斯牧师起先似乎不好意思对一个陌生人讲他妻子病情中涉及隐私的细节。但故事一旦开了头，走上正轨，艾雅司便觉得他是个心地善良、很有头脑的人，一心想着怎样让妻子重新恢复健康。他边讲边不时点头，好像为了使自己放心，他说的都是真话。艾雅司因此而能将所有细节串接成下面这个故事。

这位年轻女士在中国生活的第一年中，得了一个毛病，大



白天常常渴望睡觉。从前她开展教学工作曾经精力极为充沛。每当睡意向她袭来之时，她就会零零星星地说些德语。童年时她在家听父亲讲过德语，尽管实际上她的母语是英文。她丈夫不会说德语。她渴望休息的同时，白天偶尔还伴随着一种睡意朦胧的状态——帕瑞戴斯牧师称之为“醒着做白日梦”。甚至在陪访问传教团的客人吃饭和谈话的时候，这位传教士的妻子也会站着睡着。

他妻子有一次跟随一队英国传教士和医生长途旅行穿过中国内地，开展福音传教活动时，视力忽然开始出现某种异常。该队有一个英国医生给她开了一副镇静剂。但治疗一结束，视力就又异常了，于是他给这个病起了另一个名字，叫幻觉症。

简单说来，她能在没有动物的地方看出动物来。这种动物幻想症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果它们是蓄意发明出来的，那倒是对想像力的一种赞美。她看见了小耗子，大老鼠，害虫和毒蛇——她似乎专拣那些精典的讨厌动物来想像。她老是挥之不去的一个幻象就是一条图案色彩斑斓的蛇，从她视线边上的地板上爬过去。她的动物幻想症伴随着对真动物的恐惧。她只要碰到皮毛之类的东西，哪怕是外套上的皮毛，也会感到恶心。她有一头宠物小狗，从前巴结讨好她，现在却让她厌恶，她有一次吓得发作起来，操起手杖把它打死了。

根据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基督教传教团的看法，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这个病人得了一种恶性的厌恶症，她把当地人，甚至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信基督教的中国人都唤做狗。她还开始受着严重的火焰幻象的折磨。她觉得好像她就要或者已经陷



入一座失火的大楼内而出不了。这种种幻象吞噬着她，把她一次次地抛入恐惧的发作之中，到了她都能闻到烟火味儿，听见火焰的哔剥声和其他受害者的喊叫声，手和脸上感到火烧得发烫的地步。

她跟丈夫一起回到了上海市外 20 英里处那所小小的教会学校，如今就在那儿生活和工作。她甚至对他们的欧洲同事也骂骂咧咧的，让她丈夫难为情，成了他一个甩不脱的包袱。她故意粗鲁地对待到传教团访问的人，跟她丈夫大发脾气。发起脾气来就用头去撞墙，把衣服上的扣子都扯掉，暴露自己的身体。

她的痴呆症糟糕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致她开始越来越多地呆在自己房里不出来了。她生活在一种昏暗的世界中，几乎脱离了教会学校的日常生活。她过的是伤残人那种受人保护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要依靠药物。她在两种状态中摆动，一会儿麻木不仁，一会儿又闪过灿烂的幻象，在这种状态中，她有时会在她的便士笔记本（一种小学生用来抄作业的那种纸封皮的本子）上写作到夜深。

在这种“创造性的”的时刻，她有时会离开房间，在教会学校的校园和校园外的乡间情绪激动地游来荡去。而在别的时候，她会搭火车去上海，挎着相机到中国人住的环境恶劣的地方日夜浪游——她有一个错觉，以为她是个“严肃”的摄影师。她的行为在这种时候往往会变得更加狂暴，更加反社会，因此她成了租界巡捕房的常客。头天晚上，她就这样越轨了一次，帕瑞戴斯牧师一早走街串巷到处找她，终于在一家工人茶馆里找到了她，就是现在这种可怜巴巴、精疲力竭的样子。他把



她从那儿带到了这里。

威利·帕瑞戴斯牧师以他自己那种可怜巴巴、精疲力竭的样子讲完了故事。他用手帕擦了擦他那涨红的粉红色额头。艾雅司仰靠在他的扶手椅里看了看他，混合着一种温和的探究和鄙夷的神情。“我能够指出来吗，”他平静地说，“这儿这类病例已经平常到平淡无奇的地步了。”

牧师不相信地呜咽了一声。“像我妻子这样的病例吗，你是说？”

“我见过医院病房住满得了神经病的英国女人，其中许多人都因其丈夫在殖民地服务机构所抱的野心而成为牺牲品。还有一些人就像浸透了杜松子酒的女佣人，到医院住只是为了戒酒，得到一点休息罢了。”

那个男人用平静而乞求的声音说：“可我们是卫理公会教徒呀。”

艾雅司回看了他一眼，从他胡子里露出的口型看得出一丝逗乐的神情。他说：“我们认为症结在东方。这些女人迟早是要坐船回家的，我敢说，在许多情况下，用单纯的思乡来解释也就够了。”

“这么说你把我妻子归于这一个类别了？”

“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想指出，我在中国这儿的欧洲女性中间见到过很严重的痴呆病例。最后，治疗办法简单到买一张船票回家就成。”

“我们的家在这儿，艾雅司。这些人现在都是我们的人了。我们有教要传呀。”

艾雅司看了看他，并毫不掩饰他的鄙夷。那个男人看出

了这一点,很快地说道:“不过,你同意给她检查吗?”

“我给她检查吧。”艾雅司极力想露出微笑,但其效果反倒使来客更加不安了。“正如你所说,不会产生奇迹的。你先下楼喝点茶,我看能为她做点什么。你尝一块果馅饼蛋糕看看。这儿的茶的确不错。”

朱莉娅·帕瑞戴斯醒了。她躺在皮靠垫上,环顾着她置身于其中的这间奇怪的房间。她的脸上出现了一连串的表情:怒目瞪视,皱眉蹙眼,短暂地放松身体,堕入先前无精打采的状态,跟着又神情沮丧,样子绝对可怜巴巴。她开口说话时——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艾雅司的问题——声音因唾沫分泌过量而含混不清,唾沫不时从她嘴角控制不住地冒出来。

她长得并不漂亮。她的黑头发短而不干净,她的脸瘦得使眼睛看上去大得很不自然。她肤色苍白,显得贫血而不健康。她神经质的小小身材十分消瘦,仿佛从少女时代起就没有丰满过,而且,看起来她没长乳房。

从她躁动不安、痉挛性的动作,从她习惯性地堕入一种仿佛戴了面具的麻木不仁的表情,艾雅司一眼就看出,她真的患了一种严重的神经病。她脸上那张面具不时连招呼都不打,就扭歪起来,好像得了三叉神经病一样发着痉挛。她的手特别细,指关节上皮绷得很紧,指头都发红了,好像患了皮炎似地出现一块块鳞斑。她的脸衬着一对黑眼睛,两边凸露的颧骨和一头短发,显得十分消瘦,艾雅司不禁自问自道,她是不是得了什么器官方面的毛病,是不是本来就受着某种消蚀性疾病的折磨。他从她丈夫的描述中得出结论,认为她是个癔

病患者。一个原来给她做过检查的医生看样子也同意这个假定。

艾雅司意识到这一点时苦笑了一下。他走到他的桌旁，慢慢地，有条不紊地打开了他的手术包。他这个专家医生还没专家到不必去对付饭店客人得的那一类普通病痛，什么翻胃和拉肚子呀，什么喉咙疼和伤风感冒呀等等，这都是身体不行的男人的家常便饭——也是这类男人偶尔对充满异国情调的精神花园的一种劫掠。他翻找着袋子里的内容——听诊器、血压计、镀珞的大注射器和一盒针头，又找了找另一只箱子，里面装着几安瓿吗啡针剂。

此时，这个小女人险乎乎地坐在皮靠垫的边上，眼睛闪闪发亮地注视着他，不时用手背擦她的下巴。他走到她跟前，帮她脱去她那件褴褛的黑毛料西式上装，然后挽起她的衬衣袖子。

他没猜错。她右膀子上面布满了针眼。他注视着她，但她往下面膀子上看了一眼，脸上毫无表情。当他往他桌边走去拿注射器和一安瓿吗啡针剂时，他听见她喉咙里发出一种深沉的好似抱怨的嚎叫声——跟一头生病的动物的呜咽声一模一样。啜泣声，吸鼻子声，把唾沫往里吸的声音。他拿起酒精瓶子和一点废棉头。她把膀子伸出来等着。

“今天就算了，”他说，“让你那只膀子休息一下吧，我想。”他把她的裙边撩起来，越过膝头，一直撩到长统袜围住的大腿根处。他用酒精在肉上抹了一抹，然后拿起注射器，把针尖扎进安瓿针剂瓶上绷紧的橡皮里，把推子拉了起来。他把针头插入她干净而白皙的股肉中时，她身子缩了一下。



那天下午，艾雅司好像终于能一个人呆一会儿了。他的房间有一种黑暗、静谧而空荡荡的感觉。他此时无事可做，有点儿烦躁不安：星期六他一般要像英国人那样给自己放半天假。艾雅司回到他的书房，这是公寓前头一间大房，俯瞰着下面的街道。房间一角是一扇华丽的琥珀色和玫瑰色的玻璃窗——他一向认为在饭店客房安这种窗户是件很怪的事。小小的壁炉周围镶嵌着瓷砖，颜色跟琥珀色的玻璃很相配。星期六下午有一种寂寞的气味弥漫了他的各个房间。屋里有股家具擦光剂的陈旧气味和一股淡淡的橙香，使他不知怎么想起了威利·帕瑞戴斯牧师。

艾雅司关上百叶窗，又拉上窗帘，然后打开两盏落地灯，由于上海市供电量不可靠，灯泡光线不稳定地时强时弱。跟着，他让他笨重的躯体落坐在冬天的炉边椅里，那是一张尺寸过大的安乐椅，木椅背上有雕花图案，套着勃艮第红葡萄酒色的天鹅绒和有花纹的表面缝成图案的锦缎。他又拧亮了他的绿罩台灯，尽管他并不想去桌边坐下，看那成摞的邮件和一堆堆的英文报纸和期刊。

这时，他书房的门打开了，他的中国侍从端着托盘和咖啡出现了。侍从出去后，艾雅司伸手去拿咖啡壶倒咖啡，然后只穿衬衣和马甲往椅背上一靠。他啜饮着咖啡，出神地想着什么事儿。也许他头痛，但从他脸上的迹象看，他更像在回忆一件忘却的往事，而不是在想突如其来的疼痛。他太阳穴上有一根青筋在跳动，在轻轻地、持续地悸动，好像在提醒他回忆一件事情。



一会儿，侍从又走进来，这一次他把艾雅司的烟具拿来了。一盏酒精灯，两只烟枪和一只精工雕刻的玉盒。烟枪在沉默中准备好了。侍从拿了一小团粘糊糊的鸦片，在大拇指和食指间搓揉着，然后把它用针挑着，放在酒精灯的火焰上烤，直到发出爆裂声。艾雅司俯身向前，把烟枪凑近嘴边，侍从就把针探进烟枪里。烟枪发出爆裂声，艾雅司把烟吸进肺里。

侍从用装第一杆烟枪的方式把第二杆烟枪准备好，就离开了。艾雅司把烟抽完就躺回到椅子上。这样过了很久。他的思绪不想跟他交流，免得扰乱他的这种恍惚状态。他感到产生了一个想法，但还没来得及分辨它是什么，它就消失了。他感到，他差点就要跟他自己做一次关键性的忏悔了，但他控制着自己，不采取这种一旦承认有罪，话就再也收不回来的步骤：他此时的感觉有点像杀人犯。

艾雅司有个习惯，他每星期都要进城两三次，去拜访他的画家朋友。他最近结交的一位画家名叫摩根，他是伦敦斯雷得学校的年轻毕业生，也是他的苏格兰老乡。艾雅司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在中国人居住区一间没有暖气、没有家具的房间，饥寒交迫地过着野兽般的生活，他在这地方睡的是石头地板上的一张草席子，在破旧包装盒的两边——也就是在他买得起颜料时——画画。由于艾雅司是他的赞助人，他安排那人在老式的美国租界里找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居所，每周付他一小笔津贴并替他出模特儿的费用。

这些模特儿一成不变，总是那些稚气未脱的中国少女。



两个男人要是知道她们的实际年龄,肯定会大吃一惊的。她们都是妓女,是艾雅司亲自从涌泉路一家妓院找来的。画家把模特儿使用了一整天之后,艾雅司有时晚上也把她们使用一下。由于这些少女都长得身材瘦小,因此他自己粗大的块头与她们在性上形成的对照让人看一眼都感到难受,但正是他所喜欢的。他脑子里把所有这些女孩子都叫做“温蒂”,她们身材纤弱,体形像小男孩,乳房尚未形成,臀部瘦骨嶙峋,膀子细瘦。

艾雅司意识到自己身上这个特点,但还是任其发展。他熟知弗洛伊德说的一句话,即“正常人的性生活中很少没有某种反常的特点。”

事后,他有时会在这个地区一家夜总会给画家和模特儿买一杯饮料和一点吃的东西。他就是在星期六下午给威利·帕瑞戴斯的娇妻看病之后的那天晚上,在摩根住的四川路那座离邮局不远的建筑物外面看见她的。

他刚刚戴上帽子,穿上外套,走下楼来。她好像正站在门边,犹豫不决是进门还是不进门时,艾雅司出现了。她立刻转身走开了,裹在一件厚厚的大衣里,紧抓着篮子不放,沿街匆匆地走去。

这时已近午夜,街上空无一人。几个乞丐紧紧地搂在一起,在邮局的门道中避风。这小妇人跑得如此仓促惶急,尽管乞丐们眼睛跟着她转,但没人向她接近。

艾雅司跟在她后面走,先是隔着二十码,接着是五十码,然后是一百码。她没转身。她最后走进法租界中,艾雅司还是跟着她。法国巡警没从哨位出来。艾雅司看见他们脑袋的



影子在毛玻璃的亮光中移动。

朱莉娅·帕瑞戴斯进入了一个由经济公寓组成的地区，这是老鼠出没的寄宿舍，污水直接从住的地方流到大街上。在这些建筑物之间，临时用锤平的洋油马口铁罐，包装箱和凡是能够找来的其他材料搭了一些住处。每隔几个月，一队法国士兵就从租界穿过，把这些棚子拆掉，把住在里面的那些可怜的人赶到大街上。但这天晚上，吵醒这座贫民窟里的居民的唯一声响就是这个女人跑动的脚步声，以及远远掉在她身后的艾雅司医生沉重的足音和费劲的呼吸。

他现在来到了租界的一条大道上——他以为这是爱德华七世大道，但因为没有街灯，他不敢肯定。这不是他通常来的地方。摇摇欲坠的建筑物在这儿已经让位于公寓和大房子组成的街区了。从一幢幢房屋暗淡的窗户里，突然传出片断的谈话声，唱歌声，吵架声和孩子的哭声。一家家店面用洋铁皮覆盖了起来，较为殷实的店家则在门前拦起了沉重的铁栅栏。艾雅司转过下一条街角时，她不见了。

他知道，她一定是消失在一家低矮黑暗的建筑物中，这种建筑物常被贪心不足的房东分割成拥挤的单间，往往两三家人合住一间。

他顺着那条样子凶险的街道往回走，感到又冷又寂寞又害怕。此时，一幢幢建筑物在他看来都是一个样子，尽管高处偶尔有一两扇窗户亮着煤油灯微弱而摇曳的灯光，但让人很不放心。他不能完全摆脱这样一种感觉，觉得那女人的身影诱惑他进入了某种危险的境地或某种伏击圈中，此时此刻，随时都可能有人从阴影中冒出来，站在他的面前。



他没办法,只好加快步子,沿街而去,想到较为安全的法国巡警哨位,叫一辆出租车,设法讨价还价,回阿斯特王朝饭店。他在停车处第一辆车的车窗上敲了一下。司机突然惊醒,坐了起来,也许以为艾雅司是一个法国巡警呢。

这事之后,他在城里见过她几次,她总是穿着同一件旧雨衣,头上系着同一条头巾,臂上挎着一只购物提篮。人家若不仔细观察,而又碰巧了解她干什么职业,就会断定她是在为城里的穷人提供帮助,为被遗弃的人们安排食宿。

一般来说,她总是跟艾雅司隔得老远,或夹在移动的人群中,而不必跟他打招呼。他只有一次看见她有另一个人陪着。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们俩人正在手挽手,在阳光下的外滩散步。她那高个子的同伴戴着一顶男士帽,挟着一个公文皮包,艾雅司从路对面假定那是她丈夫。跟着,这两个人横过马路朝他走来,他这才看见她是个女人,帽檐下的面部表情十分严肃。她们走过时离他很近,他都能看见她俩衬衣领子上闪闪发光的银十字架了。他无所事事地尾随她们一直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和反缠足会的继任妇女学院所在的那座阴森的大楼。她们走上阶石,消失在里面的阴暗处。

一天清晨,艾雅司还穿着参加黑猫夜总会时穿的晚礼服,在新鲜的空气中往家走时,一眼看见那个叫帕瑞戴斯的妇人正在菜场徜徉。

他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这时她抬起头来,看见了他。她认出他时吓了一跳,头猛地一低,使用手分开买东西的人,从中穿过。她穿戴的还是同一件雨衣和同一条头巾,样子显得



怪可怜的。艾雅司头天夜里喝得多了点儿,因此这时能够硬起心肠,决心这一次一定要追上她,便无情地用肩膀推开清晨购物的人们,从人群中穿过。见他离得很近了,那女人就停下来等着他,他都可以从她眼中看出紧张来了。

她臂上挎着提篮,就像她是到这些贫苦的中国家庭主妇中间来买菜的。这时,他一眼瞥见菜篮子里一架相当昂贵的照相机。她看见他在看时,就一把将篮子拿开了。

“我照相。”她简单地说。

然而,这说起来可不是那么一件简单的事。一般人不是说“我拍照吗?”但这个小传教妇人用这个动词时口气十分强烈,几乎像是对抗一样。跟着,她的目光又变得模糊不定起来,她看着别处,不断地倒换着脚。虽然两人之间都未明言,但都清楚她在摩根房外像幽灵一样消失的那件事。艾雅司酒还没醒,决心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报复她一下。他请她共进早餐,使本来就不安的她现在更加不安了。

她也许是因为窘迫,也许是因为想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借口加以拒绝,反正不管是哪种原因,她最后还是接受了。她说她很愿意跟他共进早餐——但只能喝一杯茶。

对艾雅司来说,早餐习惯上是一个大餐。他喜欢把他的一天建筑在由花样繁多的谷类副产品和鸡蛋组合成的早餐之上。他特别偏爱在排骨和薰肉里加一点儿猪肝或腰子,以抵消平淡无味的鸡蛋。对他来说,吃早餐只喝一杯中国茶,那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他还是温驯地跟在她后面,穿过人群,头戴绸子高统帽,身穿燕尾服,脖子上围着白丝巾。

在这些开着集市的大街小巷,茶馆星罗棋布。欧洲人一



般不到这儿来，这些店铺粗糙简陋，专门提供快速服务，好让工人顺路就餐。但这位传教士的妻子好像特别留心一家茶馆。他们进店时，坐在长板凳上喝茶抽烟的苦力都盯着他们看。此时这些苦力要是穿着背心和打满补钉的衣服，到阿斯特王朝饭店去吃正式茶点，那也跟艾雅司现在身着晚礼服和她一起在这儿出现一样让人感到极不协调。

朱莉娅·帕瑞戴斯喝茶的时候好像不大想讲话。她环视了一下周围简陋的环境——积满污垢、漆成绿色的桌椅板凳，茶壶里的蒸汽冒在窗玻璃上像小河样直往下淌水，地上满是锯末，到处都罩上了一重厚厚的廉价烟草的烟雾。她的眼睛不时跟艾雅司的相遇，而且，她好像还爱大笑，这使艾雅司感到吃惊。坐在板凳上的工人都一声不响，带着怀疑和恐惧注视着这两个不速之客：进来的这人也许就是魔鬼本人吧。也许这妇人因诱使艾雅司穿着晚礼服进入这个猴子笼而觉得挺逗吧。过了一会，艾雅司说：“你看我们离开这地方，到一个环境更合适的地方喝茶——”

她只摇了一下头说：“不是因为这个。”

“我住的饭店供应的早餐很好。”

“我敢肯定是这样的。”她此时说话含讥带讽，露出两颗虎牙，但他不知道这是为了幽默呢，还是含有恶意。他小心翼翼地想好了他的下一句话：“你知道我住的饭店吧，我想。几周前，你还看过我呢。”

她好像没有听懂他的话。他继续说：“是那天晚上在摩根家外面我看见你之前。”

她干巴巴地听着他对事实的陈述，不动声色。她并不否



认此事。她怎么能否认呢？她眼睛低了下来，但很快又迅速回看了一眼，接住他的凝视，那种对抗的眼神艾雅司一直认为是很典型的。一刹那间，他很害怕她会质问他凭什么跟踪她。但她继续很快地说道：“我在城里过了几夜。为我的照片寻找主题。”

“在黑暗中吗？”

“是呀。”她不想屈尊俯就地进一步解释了。

他狡猾地说：“这么说你和摩根认识罗？”

艾雅司注意到，一些肉体紧张的老症兆悄悄地爬上了她的面部。那种抽搐沿着一只鼻孔的边缘又回到了她的一边脸颊上。她开始说话的声音又带上了一丝德国口音。她的思想停落在一个想像的物体上，她停住不讲了，吓得把要喝下去的一大口茶都含住不喝了，艾雅司知道，她又看见她的那些野兽了。有一会儿，她好像在看艾雅司，但其实是在看着一头幻想的动物，谴责他道：“你把她杀死了。”

艾雅司手边没有救护包时，人就处于劣势。很明显，她坐在木板凳上身子前摇后晃的，产生幻觉了。他知道得赶快带她离开这个地方。

那一批中国工人已经走了，别的人进来，占据了他们的位置。他们看见欧洲人时产生的好奇心——哪怕是这种穿着晚礼服到集市的茶馆喝茶的古怪欧洲人——很快就消失了，对这位妇人的奇怪举动，他们睬都不睬。艾雅司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啪”地一下把几块铜板拍在木桌上，大步走到她的身后，把她整个儿从凳子上抱起来，扛在肩膀上。这时，那些中国顾客带着强烈的好奇心跟着看他的每一个动作。他把她抱



起来时,她的篮子碰翻了,相机“喀啦”一下子滚过有锯木屑的硬石板。一个旁观者狐疑地把这件黑色物体拾起来,又把篮子拾起来,然后把它放进艾雅司空着的那只手里。他就这样走出了烟雾腾腾、暗淡无光的茶馆,来到清晨洒满阳光、气味刺鼻的大街上的人群中。

那天上午,艾雅司在阿斯特王朝饭店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他一生中所见到的最易受暗示影响的病人。他在维也纳学习过的那些女士的病例,甚至连大师本人传奇性的成功,都不曾提供这样的治疗者,能像这样通过催眠术而接触到其“躲藏起来的”另一个自我,而且跟她展现给世人的面孔形成如此明显的反差。

这倒不是说,艾雅司上了当,相信某些方面因支持催眠疗法而提出的那些过于牵强、荒谬可笑的说法。他在维也纳学习催眠疗法时,就知道催眠始于触摸,是要用双手去抚摸的。这使他发觉了朱莉娅·帕瑞戴斯极易受暗示影响。他开始只是按摩她的斜方肌,然后按摩她的后脖颈并顺着双肩往下按摩。这些部位的肌肉不停地抽搐,而且结成紧紧的束状。她有几次睁开眼睛,用英文要吗啡。按摩了一阵子后,他让她睡了半个小时,以便缓解一下她的焦虑。艾雅司趁这段时间给自己放了一池洗澡水,换了一身平常白天穿的衣服。他叫人把咖啡和鸡蛋送上楼来,在他的诊室里吃了早饭,同时仍然看护着她。

当他看见妇人已经醒来,而且比较放松时,他鼓励她谈谈她在澳大利亚度过的童年。他温和地向她提问,诱使她回答。他任她信马由缰地讲,并不为了使她谈话进入正题而打断她



的话。渐渐的，她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为他拼就了一幅栩栩如生，与其夫所描绘的她的早期生活细节大相径庭得令人不安的图画，使艾雅司都不敢相信，按公认的催眠的意思，她是受了催眠的影响。他觉得她在动物世界里的那些疯狂而常常又是淫秽的想入非非不过是些幻想而已。他的结论是，在催眠的作用下，她实际上随着潜意识的梦境发生而“讲述她的梦境”。与此同时，她还足够清醒到能跟他讲话。

后来，她完全清醒过来了，这时她坚持说，她在澳大利亚北昆士兰父亲农场度过的童年是安定而幸福的。她跟他说，她从前是个正经而又信教的女孩子，她嫁给牧师似乎是十分合适的。这时，艾雅司把她在受催眠影响时讲的一些事情告诉了她。她虽没打他耳光，但一开始她看上去好像想打他耳光似的。最后，她简单地说她不相信他。

她同意三天后再回来看他。到这时，这个病例已经真的引起了艾雅司的兴趣。她离开前提到，她刚到中国不久，就得了一场重病，使她不得不在美国医院住院。“我当时差点死了，知道吗？”她告诉他。跟上海电话系统搏斗了一个小时之后，才否定了她这个病得要死的说法。美国医院的记录表明，她前年曾住院三天，得的完全是一般肠胃炎。

她每星期二都坐火车进城，下午就到艾雅司的诊所看病，让他施以催眠术。他对她在精神放松的情况下所卸下的大批库存的想像产品大为惊讶。他很有规律地给她开吗啡吃，以帮助产生睡意，但她在睡前常处于一种心醉神迷的状态，往往要持续几个小时。有时候，他利用这种心醉神迷的时候鼓励



她详细地描述她的幻觉。妇人亲口描述这些恐怖的形像,似乎可以从中得到莫大的快慰,同时也使这些形像没有了伤害力,每当这种时候,她醒来时都感到神清气爽。但这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情:艾雅司坚信不疑,他终于能够接近她童年时灵魂中经历的那些事件了,这些事件就是她所患的歇斯底里症的病根。

她的幻想并非总是持续不断。她有时情绪轻松到不要人提示,就可以谈起在教会学校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他们的传教团致力于实现让女童受基督教教育的理想。这项活动引起了当地一些比较传统的家庭的反对:不久前,缠足还是法律许可的一种做法呢。朱莉娅·帕瑞戴斯谈到她去年教的两三个女学生,其家庭因为外界的压力而要她们退学了。其中一个女生好像死了——反正她讲这事时感到难受,因此艾雅司很明智地中断了他的提问。

但就是谈得较为开心时,她仍受到幻觉的骚扰。正当她为他背诵一首诗时——她能够背诵几首济慈的诗和一首柯勒律治的诗——那些动物就埋伏等待在艾雅司的诊室里。她背诵到某一行时常会踌躇片刻,艾雅司把暂停的这一刻解释成是她在床下看见了一只老鼠在动。她偶尔会堕入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对此,艾雅司业已习惯,就跟认识她的人一样。一天下午,她正在说话,却突然打住话头,抱怨说他们面前的地毯中央正正地坐着一只很大的癞蛤蟆。他们居然还为这事感到好笑呢。

但更经常的是,由于要对付幻觉,就算是筛选她的感性认识吧,以便查明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想像出来的,使她感到



压力太大,因此过去的恐怖感会再度出现,同时伴随着她歇斯底里症状的恶化。

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她极为详尽地向艾雅司描述了关于动物的这些幻像。精致的鞭状的蛇“色如红土”,癞蛤蟆“大若男人之手,呈淡白的人肤之色,令人毛骨悚然”。她的视觉周边只要发生任何突如其来或不期而至的动物——如窗帘在微风中掀动——就会有一种在她眼中把自己变成动物的力量。

当然,这些神经质的症状又因她服用麻醉剂成瘾而复杂化了,为了控制这个局面,艾雅司已经尽了最大力量。有时,为了防备晚上睡得太差,她能够说服他,让她在一天五克安甬的定量之外再加一克。但她好像找到了这种东西的另一种来源,有的时候在星期二,他从她懒洋洋的动作和无所谓的表情上看出来,他规定的用量已经超过了。艾雅司断定,她丈夫肯定对此一无所知。这个情况对艾雅司也很合适,他对没有药瘾的人对药瘾的看法是多么错误了解得太清楚了。再说,她虽然是个瘾君子,调理得还算比较合理,艾雅司到现在已经绝对坚信,药瘾问题不是她的根本问题。

即使受了吗啡的影响,她依然能够头脑清楚而理智地交谈,只是当她像现在这样身体像喝醉酒一般,头发乱蓬蓬的,眼神放肆,她才在艾雅司身上产生了一种怪诞的性的吸引力。事实上,她苗条的孩子气的身段已经开始使他兴趣大增。她的一对眼睛主宰了她那张貌不惊人、长满雀斑的小脸,她极力向他解释幻觉丛生的强烈状态时,这对眼睛就在那儿闪闪发光。他们之间的交谈一般有一种含讥带讽的逗笑成分在内。



“你怎么知道这些野兽实际上不在那儿呢？”她问。

“别人都没看见嘛。”

“那要是它们真的都在那儿，只不过你我当时都看不见呢？”

“胡说八道！”

“野兽也许真的在那儿，但是为了骗我而躲起来了，难道这是不可能的吗？你至少应该承认这个可能性吧？”

“不！”他大笑道，“它们就想惹你生气。它们可没有什么跟我过不去的。”

“不！”她大笑时，她那张严肃而担忧的脸整个儿改变了，出现了一种即将参加某种特别乐事的少女的表情。

“也许你找的时候还不够努力吧。”

“只有疯子才这样想。医生不会的。”

“那你怎样用别的方式来理解你病人的病痛呢？”她顿了一顿，然后补充道，“我以为你除了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病人了。”

她认真地看了他一眼，嘴唇抿得紧紧的。她开始大量流汗，尽管这天并不太热。

“你现在看见野兽了吗？”

她嘴巴不出声地做了一个“不”的动作，但她脸上那种或心不在焉、或凝神注意的表情使艾雅司倾向于不相信。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艾雅司详细地询问她的童年，两人之间就横起了一道不可见的障碍。这倒不是她不愿合作——她谈到她的童年时细节栩栩如生，甚至牵强附会，以致艾雅司总是以为她又产生幻觉了。



后来,正当他以为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了死胡同时,一天下午,她在情绪相当轻松和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跟他用德语说了一句什么。他当然记得她父亲在她童年时用的语言是德语,也记得她丈夫说过,她在精神崩溃的初始阶段爱讲德语。

艾雅司本人在维也纳度过的那一年中学会了讲流利的德语,因此他十分明白她讲的话:“Also sie haben noch einen Heizer geschickt。”艾雅司本能地装出不懂的样子,并含糊地应道,“什么?”她大笑起来,然后继续用英文讲起一件不大相干的事件。艾雅司忍不住认为她是在撩逗他,他恍然大悟,她在其他方面可能也撩逗过他。但她说的 Heizer,即救火队员这个字,却始终留在他的脑海里。他们派了一个救火队员。这好像是一个线索。当他假装没听懂时,他一眼瞥见她在看他,虽然只看了一下,但明白无误地看了一下,眼神中有点鄙视的意味。

她的病要痊愈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偶尔,她会几乎惊慌失措地出现在他的门口。她一句招呼也不打,就脱掉外套,在艾雅司的软皮垫上躺下,烦躁地等待开始按摩和听那些宽慰的话。当她像现在这样紧张时,话就会从她口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她的种种幻象,她从前对动物的种种恐惧和厌恶,她对一个死去学生的感情,关于威利和传教团的一些小事就会脱口而出,杂乱无章——梦魇和现实缠绕在一起。她的大脑好像一个高压锅,里面装满了这类恐惧和形象,如果她不每周到艾雅司那儿看病缓解一下,这一锅东西似乎就会在她的脑袋里爆炸,她的歇斯底里症就又会发作了。

野兽,那些狡猾的家伙,正冷酷无情地埋伏着等待她:她从教会学校出来无论到哪儿去,癞蛤蟆和蛇都跟着她。艾雅



司浆过的床单,起波纹的床罩和漆成奶油色的床栏杆都没法挡住它们。一个星期二,她在注射过吗啡之后醒来,发现一只浮肿的癞蛤蟆正端坐在她的肚子上看着她。她有很多次在艾雅司的起居室看书时一抬头就看见皮包骨头的棕色的蛇正扭动着身子,一声不响,小心翼翼地镶木地板上爬过。艾雅司害怕她会成为一个始终否定科学的活样板。

终于,过了很多个星期之后,开始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病人的精神好像突然有所改善,她总的健康状况比以前好了,她的幻觉也不再那样经常骚扰她了。她能够更加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教会学校的生活中去了。她报告说,她丈夫已经允许她参加部分教学工作了。在天朗气清的早晨,她把女生带到室外,在传教团花园的桑树下背诵诗歌。她甚至谈起了度一个短假的计划。由于这些事情占据了她的大脑,她觉也睡得好了,看样子她夜里也不再在市内游来荡去了。

只是跟医生在一起时,朱莉娅·帕瑞戴斯才继续探索她那疾病的世界。在他百叶窗关起来的黑房间里,随着他烟斗里的烟飘起来,去迎接天花板上摇曳不定的电扇叶片,她颇有自信,甚至厚颜无耻。她开始故意地向艾雅司透露她童年的一些细节,就是这些细节曾以“幻觉”的形式深深地惊动并激动了他。此时,她开始冷冰冰地、有条不紊地为他构造了一幅她父亲约阿契姆·约汉尼斯的画像。

她躺在医生的床上,很放松地休息在他硕大的淡色膀子的臂弯里,或者背对他,面朝墙壁,睁着眼睛,头在枕上不时变换位置,测量他的反应。后来,她爬到他的身上,膝头朝地骑着他浮肿的肚子,好让他看她平坦的小胸脯和黑色的坚果般



的乳头。与此同时她一直不停地讲着,好像停不下来似的。

他们每星期二下午定期进行的私通就以这种方式开始了。



2

她 30 岁那年，当她为她给“蜜瓜”·艾雅司唱的那首疯狂的曲子所吸引时，朱莉娅·帕瑞戴斯常常会谈起她曾度过童年的澳大利亚北部鸭河地区。她特别喜欢详细讲述她坐在曼姆那家妓院屋顶上从惊恐万状的父亲身边平静地漂走的那天早晨。

她父亲约阿契姆·约汉尼斯是一个德国出生的探险家和博物学家，他的业绩如今已湮灭无闻。他常常离开他和他的英国妻子继承的那幢坐落在森林边缘沼泽地上的大木房子而出门在外。朱莉娅是在这幢房子里出生的，她还生动地记得



幼年时黄昏时分像烟雾一样升起的蚊虫的声音和景象。她还记得喀那喀人和中国仆人一边用他们那种奇怪的混杂的语言聊天,一边忙着把小朱莉娅领进屋,在很大的尖铰链窗外罩上蚊帐。就在那时,在她母亲还未病死之前,保姆和女家庭教师就把朱莉娅的生存给破坏了。

当他不屑去攀爬西部那些神秘的颠峰,或到南方的海洋上航行,而是呆在家中时,她父亲就会到棕色的鸭河上泛舟,光着胸脯在热带阳光下划着船,船头放着素描本和一壶盖着柳条的葡萄酒。在她与喝得半醉的父亲在平底船上度过的那些辰光里,孩子觉得好像她的生活目标已经达到了。

第一次带她乘轻便马车到那条宽而缓慢的河流去的是她父亲,他把她引入了那个由河中野兽组成的世界中。他划着船,鼓动着巨大的胸肌和臂肌,不慌不忙地向她指出活跃的鸟类中的不同族类和棕色河岸上晦暗的绶带般的蛇。通过她父亲约汉尼斯“博士”这个头戴小登山帽、牙齿紧咬着雪茄的大汉,她第一次产生了对江河野生生物的热爱。她父亲首先受到了妻子的责怪,跟着又受到他雇用并诱奸的那些女职员们的责怪,都说他不该把她们照管的这个小孩子培养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男孩子样的姑娘。

多年以后,在发大洪水的那个早晨,父亲与蒂娜·特莉娜一起站在曼姆的大陆饭店屋顶上,一幢幢建筑物和内地的大群动物从他们身边疾速漂过。他万分惊讶地发现他的女儿操纵着舵柄,娴熟地避开大树干和牛、羊、猪泡胀的尸体,这些尸体沿河漂下来,直到三角洲和红树地带,最后流进了大海。

朱莉娅很小,而世界大极了。为了上课,她早早进了屋。



她喜欢父亲那间有皮椅子，大红木桌和四壁都是书的书房。但她更着迷的是他的实验室，实验室通过一扇有毛玻璃的门跟书房相通。她父亲就是在那儿剥制他的动物标本并在那儿放着他所有的器械和一盘盘地质标本。就连那种种奇怪难闻的气味也吸引着她：甲醛、氨和用甲醇变性的酒精。她最喜欢的还是观察她父亲在那儿工作，看他在马甲和围巾上系着长围裙，对生物与非生物施展他的科学魔法。

他在当地人中的名声很大，因此，她有时候进屋时会发现他正在察看一个患牙痛病的长着连鬓胡子的岛民，或者变戏法一样地从名叫德·伏尔的三个胖姐妹之一那儿变出一个婴儿，她们都住在这个小拓居地的边缘，都爱戴着面纱，扎着皱纹纸玫瑰的一模一样的草帽。

她伸手总是够不到门把手，父亲放讲稿的小台架上那本黑《圣经》她也几乎拿不起来。今天，她要他跟她读《圣经》，但书房空无一人，房里只有皮椅子的气味和穿过毛玻璃而入的另一边的灯光。她在这儿看见她父亲的影子俯在里面什么东西上——俯在洗脸盆上，或者也许在对着镜子梳理胡须吧。

她在光线暗淡的书房里站了很久，对她听见的那种呻吟声感到大惑不解，同时注视着他在毛玻璃那边弯腰工作的身影。她要推迟他因她进屋而又惊又喜，然后回到桌凳边工作的那一美妙时刻。

小姑娘围着干净的围涎，她父亲那本黑色的《圣经》抱在她的臂弯里，走到毛玻璃跟前。影子继续动着。她碰了一下门，门就开了，她感到很累。书从手里滑落，掉在了什么地方，她慢慢地进了屋，好像她正在穿过睡眠中那片温暖的风景。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她惊讶得都没时间喊出声来，甚至没时间闭上眼睛。然而，此时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话，她的声音十分苍老，好像是另一个人在说话：“爸爸吗？”

小姑娘一眼瞥见他们家的女仆人多莉·杭，丰满的嘴唇，也斜着眼，双颊上有一道道平滑的疤痕组织。她脸上现出痛苦和对这孩子的同情。她正弯腰向前，身子俯在擦拭过的木桌子上，裙子掀起来围着肚子，屁股露在外面。她父亲衣冠楚楚，各方面都保持着体面，除了裤子尿口扣子敞开以外。此时她父亲往下看着那女人，正做着从后面进入她的身体的动作。她的脸让朱莉娅害怕，好像很吃惊地发现她在那儿。这时，女孩已站在门边了。

女孩子转身就跑，带着她惊人的发现跑进花园，她的母亲就埋在那儿。茫然的蓝色的下午迎接了她。这个温和而庸俗的日子缺乏任何愤怒的感觉。洗涤过的湿衣服在晾衣绳上忽啦啦地拍打着，好像在哈哈大笑。

“道格拉斯！”孩子叫道。“道格拉斯快来呀！”

她眼睁睁地看着他跑上前来，好像使用了父亲用慢转镜头拍摄，然后用普通速度放的照片那种手段。道格拉斯·杭身体前倾着从菜园里跑过来，手里提着他用来挖土豆的铁锹。磨快的锹尖在阳光下闪着光。他握着的铁锹低低地在空中两边挥动，身体毫不费力地从一个姿势变换到另一个姿势地颠簸着跑，到了她的身边。可是，事情不好了。多莉·杭已经到外面花园来了，她还是向前弯着腰，露着光屁股。杭家所有的成员和早已去世的先人都穿着礼服向前迈进，与同样颠簸的步子保持着一致的步调，好像是经过精心排练的舞步，那条龙



的龙骨只有这孩子一人看得见。

他们的步履在时间上配合得十分准确，他们魔术般地行动着，微笑着，这些幽灵，他们通过脸上的微笑表明他们知道她在那儿。这明白无误地是认出她的微笑。朱莉娅觉得奇怪的是，他们竟然不想用语言跟她讲话。先人模糊的动作又集中在她身边的道格拉斯·杭身上。她听见水泵中的水激溅在铁桶里。跟着，她的颊上感到了冰凉的水滴。

接下去，她抬头瞪眼瞅着多莉·杭的脸。起先她并不明白这个女人怎么会来到有班芽——班芽树（土著语，大叶南洋杉——译注）树下的院子而同时又在她父亲的实验室里的。跟着她就意识到，时间一定已经过去了，此时她正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张灰毯子。

世界变黑了，当它又亮起来时，多莉·杭的脸并没有消失。孩子发现她自己急急忙忙地想讲话。她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一种盲目的需要，想把词语乱吐一气，令其穿过口腔，进入空中，但因多莉·杭在场而投下的咒符和模糊一团的杭家的先人们一路绕着她打转，她像把那些话锁在了她的舌根底下，最后死在那儿了，孩子躺在多莉·杭的怀里感到浑身发抖发痒，而且发现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的病使约阿契姆突然改变了抚养孩子的态度。现在，他很爱护这个小哑巴，都快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了，限制她的行动，到了残酷而不自然的程度。孩子从前总是在户外上晨课的，现在却被关在黑屋子里。上的完全是英语阅读课。尽管她不能够说话，看样子好像也听不见人家的话，朱莉娅把一小



时一小时的时间都花在了书本上。

约阿契姆发现,他能够更多地呆在家中了,因此终于劲头十足地开始写他关于太平洋珊瑚虫繁殖的专论了。他每天早上都单独地在书房中度过,在多年来放进稀稀拉拉几个抽屉里的所有资料中翻找着,用他的自来水笔小心翼翼地用德语在一本皮装的分类账户簿大小的日记本里写着稿子,这是他年轻时买的,并一直为了这个目的而把它保持了这么多年。

每天下午,他都把女儿带到大自然中漫游,尽管他为她选择的穿过花园的小道总是相当安全的。

他俩在昆士兰的阳光下是一个奇异的景象,这个蓄着一撇剪得整整齐齐的山羊胡子,头戴毡帽,手执手杖,身穿轻便棉衣的欧洲“doktor”和那个小姑娘,她的脸长得像一个苍白的严肃面具,带着聋哑人特有的那种探询的表情。她现在没有雀斑了,她的容貌里甚至连一线阳光都没有。她长长的黑发扎在太阳帽檐下,她骨胳纤细的手腕竖起来,心里总是提防着来自花园小道两边丛林里的突然袭击。她顺小道散步时眼睛两边眯着,这对眼睛随着夏天的消逝而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令人动心了。

孩子好像一眼能看透父亲,这使他大惑不解。他从中并看不出任何对他行为的谴责。在冷冷的凝视的目光后面,有着某种嘲弄的意味。又好像她在邀请他与她一起偷窥她依然生活的那个地方。

在下雨的季节,他常常会在每天下午同一个时辰在屋子朝南,比较凉爽的一面碰到她,他把这边放满了种着外来植物标本的罐子。一天,她背对着他,好像并没意识到他的接近,



尽管约阿契姆从来都不完全相信她真的那么苦恼。鼓点一样敲打着屋顶和树木的倾盆大雨，声音十分响亮。

他在她没看见的情况下讲话了，向她描述他为她准备好的所有那些邪恶的东西，而那女孩子继续盯着看前面的雨。终于，他绕到朱莉娅的前面，良久，她都好像没有看见他。他开始以科学家的方式在心里认定，她这种无动于衷的时刻是“神不守舍”了。

尽管约阿契姆很久以来都担忧她的大脑可能受到某种形式的刺激，女孩子在她的阅读中依然继续表现出毋庸置疑的智慧。随着她十二岁生日的接近和月经的开始，她对数学的掌握下降到令他极其厌恶的程度。她对夜里迟迟不睡，跟父亲呆在花园的木制观察台里，看他拿着望远镜，察看星象图，策划一颗正在接近的彗星轨道，跟星星对着干的工作毫无兴趣。这当然是指哈雷彗星，其运行轨道在1910年接近了地球的运行轨道。这时，女孩子唯一的兴趣是浪漫文学，而且她并不满足于从她那些受教育不多的家庭教师那儿借来的廉价浪漫中篇小说。她在不过几周的时间里就把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囫圇吞枣地看了一遍，又把帕尔格雷夫编的《金库诗选》的诗全部背诵下来了。她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读柯勒律治的那首描写他如何接近忽必烈汗的王宫，听见少女用洋琴弹奏音乐的那首诗。约阿契姆对这一切不屑一顾，认为是很可鄙的，尽管作为科学家和德国人，他虽很不情愿，但还是承认他钦佩莎士比亚的作品。

这个男人为了给他女儿请到一个欧洲家庭教师，花费了极大的气力。那些年轻女性总是白白地坐火车到北方来了一



趟。一次，他从一个寡妇那儿收到一封对他在一家海滨城市周报登的廣告的回信，这位女士刚巧也有一个 12 岁的女儿。他想，要是有人跟朱莉娅作伴，也许会使她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猛醒过来。可那寡妇的女儿是个很刁钻、长着亚麻色头发的荷兰女孩，她在海滨地区教会学校的经历使她学会了一种远远超过了朱莉娅的阴险和狡猾。只要发生争执，她母亲总是偏袒她。约阿契姆不忍心看她女儿脸上那种大惑不解的痛苦表情，就把那女人解雇了，尽管她在其他各方面都是一个细心的好教师。但他解雇她是在一天夜里，他趁她最没防备的时候，把她带进他的木制观察台，就在那儿当着哈雷彗星的面把她诱奸了之后。

在《曼姆评论》的分类广告栏中，他继续寻找着家庭教师。如果约阿契姆愿意承认的话，他是不可能找到的，因为与其说他要找的是家庭教师，不如说是一个在床上继任朱莉娅母亲的人。只有敢于在外面木制观察台里抵制他求欢的女人才配得上这种荣誉。

当在苏格兰出生的维娜到鸭河的房里来住时，他想，他也许找到了这样一位女士。在他的眼中，她的国籍与英国很近，足以代替他死去的心爱的伊莉莎白。她到达后不久，就在一天夜里被邀请到观察台里去了。

她在望远镜的目镜上俯身下来时，他伸手摸着她凉爽的大腿。她叫了起来，声音如此响亮，因此不得不对她使用过量的鸦片酊，使她不省人事。那天夜里，科学家趁她被药物麻醉之机，终于征服了她。当她醒来，从血污的床单和极为疼痛的阴部推断出发生了什么事时，便一走了之。不过，后来约阿契



姆回忆起她时还是很多情的,觉得她是个 *rara avis*(拉丁文,非同寻常的人——译注),一个真正贞洁的女人。

朱莉娅到 13 岁时,乳房已经长起来了。她像从前一样跟父亲十分隔膜,他对自己说,她跟他就像从前探险过的鸭河源头的高山一样难以接近。尽管他有着科学家的热情,但他发现,他却没法去理解女儿“北方的区域”。

由于完全避免和阳光接触,女儿的皮肤开始显得跟他妻子长期患病时的皮肤一样:苍白、贫血,典型的“英国人肤色”。一天用午餐时,他们在一起喝汤,他注意到她牙齿的形状变了。她的虎牙大到了这种地步,她张嘴吃饭又把嘴巴合拢时,虎牙的顶端就歇在她的下唇上——跟他妻子一模一样。他不由自主地感到记忆的狂澜席卷了他的脑海。

在他们对滨海不常有的几次造访中,他在公共场所已经把女儿当成妻子对待了。他让她穿着他 20 年前在欧洲为她母亲买的衣服,带她到小港镇逛商店。她母亲是个个子娇小的女人,尽管如此,朱莉娅还是不得不把长长的裙边提起来,磕磕绊绊地沿着阳台下炎热的大街走去。这些衣服都很美。她穿了一件袖子贴肉的定做的连衣裙和一件点缀着天鹅绒,绣花和镶边的短腰上衣。还有一件有花边的丁香花薄绸子做的连衣裙她也很喜欢穿,天鹅绒的腰带上有一个镶了珠宝的带扣。她父亲允许她进城时戴她母亲那顶簪了一根鸵鸟羽毛,前面有一袭刚刚遮到眼睛下面的紫红色面纱的小帽子。

他带她穿着成人穿的衣裙,戴着那顶奢侈的帽子,到镇上布店隔壁可怜巴巴的阿斯托里亚茶馆,茶室就阴暗地坐落在



宽敞的阳台后面。布店老板是个矮个子，围着一件灰围裙，他总是急急忙忙地赶到店门口看他们从前面经过。他们坐在那儿的窗旁喝茶，吃蛋糕，然后坐窄轨火车在下午晚些时候回家。如果只是往茶馆的窗户里瞥一下，或瞅一眼火车厢，那种化妆品和男装的效果是颇令人信服的，但你若更仔细看的话，她那张化了妆的小脸就有点奇形怪状了。

在家时，他监督她脱衣服，以便把这些戏装在她母亲的杉木衣柜里好好地放起来，这些年来它们一直都放在那儿。一天晚上，他们坐着双轮轻便马车从车站回到家里，她刚刚脱去那件宝贵的衬裙，他就突然从后面把她拦腰抱住。他的手指头抠进了她的棉衬衣里，她转过头来，以为她可能以某种方式惹恼他了。当她看见他从胡子里露出微笑时，她感到吃惊。

他走进他的书房，拿出一本皮封面的对开本，从里面挑了几张他画的不同鸟类的水彩画。在其中几张厚厚的画图纸上，他照原样复制了书房墙上的鸟类标本，而在另外几页纸上，他画了鸟类交配的素描。

当他看见一对鸟儿像这样在花园里互相碰撞，扑腾着翅膀，他就感到刺激。他常常用拐杖把这个现象向他女儿指出来。他甚至放纵地模仿鸟儿用嘴梳理羽毛，用脚尖旋转，并哈哈大笑要女儿也一起来玩游戏。

现在，游戏就在这个杉木衣柜旁继续进行着。

在一位女家庭教师刚走，而另一位还未请到的这段空闲期，以及当朱莉娅关在房里熬夜看书这段时间里，约阿契姆变得随便起来，他光着身子在屋里四处走动。他出于对种族接



触污染观念的尊敬,已于去年把所有的仆人解雇了。

每当下午晚些时候,他通常要洗一个澡,斜射的光线穿过百叶窗的叶片而入,又顺着走廊照过来,这时,除了男人和女孩,屋里好像还有第三个人存在,这还不能完全归因于记忆中那个郁郁沉思的生病的女人,她是在屋后那间房里死去的,由于对她使用了几个月的灌肠器和热敷,使得这间房子的生命还未消失,却很早就出现了一种完全没有生命的样子。此时,在下午时分,沉默中有一种微妙而不可避免的被人操纵的意味。

有时,约阿契姆从曼姆的妓院招一个女人到鸭河来,他并不总是很小心地保证把卧室的门完全关上。到这时,他已经很怀疑女儿的耳聋是否真实。那年夏天有一次,女人因欲望得到满足而发出的嚎叫声使女孩子默默地走到门边,把眼睛凑到门缝外。约阿契姆根据门口光线的形状注意到了那细微的动静(尽管当时他依然完全占有着那个女人),他知道,女孩子悄悄走开时并没有感到羞耻,而是感到嫉妒,童年终于被抛到了脑后。

又到了雨季,每到这个季节,讨厌风雨的约阿契姆就会整天躺在床上,把百叶窗关起来,锁进一种半永久性的人造黑夜里。他戴着眼镜坐在床上,燃着蜡烛,写作用的盘子平衡地摆在他的大肚子上。他于几周前从书房拿来的参考书在地板上堆到床那样高,他的周围散放着笔记和手稿。

每当这种时候,朱莉娅的家务事就会增加一倍,跟着又翻一番,因此一有闲空,她就倒下睡觉。她得为他做饭,尽管他



人不活动,胃口却很大。她得定时给他倒夜壶,一共两个,各管一种身体功能。她给他按摩肚皮,以消除他因肠胃气胀而引起的疼痛。接着,好像自然伴随着她的护理工作,在他放过屁,器官翘起来时,她把嘴巴当成贮存器来接他的精液。

他冬眠的时间越久,他就越不想离开他的床。就像他的其他肉体冲动一样,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上还有一种更微妙的变化。自从她开始来月经,他们之间的性交一直保持着他们第一次玩“鸟戏”时纯然自发的特征,他就是通过那种游戏向她介绍了部分插入的。她把这看得十分自然,让他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行。当她在厨房做杂务,在外面花园,或者饭吃到一半时在桌边,约阿契姆就会径直走到她后面,撩起她的裙子。这一向是他享受她的方式,仿佛做这个动作时看着她那张茫然不解的苍白的脸就连他那冷酷的心肠也忍受不了。她从十三岁这么小的年龄起,就把他勃起阴茎的插入看成是自然而平凡的一件肉体功能。

现在,随着父亲在床上呆的时间越来越长,她学会了根据钟表调整他的性要求。这些义务变得如此单调,她做起来连想都不用去想。她帮他排好气后,就把自己长长的黑发从脸上拂去,把半边脸休息在那堆软软的肚皮上,开始了敷衍行事,但又行之有效的口交行为。她发现,她可以用这种姿势把脖子够到床边,把他的精液吐到一只痰盂里。

有时候,她就像这样把脸靠在床的一边,倾听着他缓缓的像磨锉子样的呼吸声和外面季风摇撼树木,吹得铁屋顶吱嘎作响,看着他散放了一地的手稿,一页页都有他用墨水写的密如蛛网的德语手写体。她半闭起眼睛,那一行行的文字就按



新的模式重新排列起来，她喜欢从这些新的模式中猜测它们可能的意思。她逐渐能从这儿那儿认出一个字来，便开始破译起他文本中字里行间的意义。手稿里还有他画得很美的植物标本，岩层，鸟兽和海底珊瑚虫自己构筑的宏大的城市。她最爱看那些纤巧的夜蓝色，威尼斯红，品红，赤褐色苹果和仙客来属植物；她还爱看玫瑰，龙血树脂和朱砂，以及他在他画的水彩画中捕捉到的那些珊瑚虫的海绿色，绿玉色和铬绿色。从那以后，每当她听到有人说德语或看见纸上印着德语，她就会又回到那间不通风的黑房间里。

约阿契姆就是在床上长时间躺着的这段时间里，得了一种皮肤病。他的左腋窝下先出现了一块皮革似的皮肤，跟着就不祥地从原来的地方扩展开来，越过他丰满而肌肉松弛的胸脯，慢慢向下面腹部爬去。

那块鳞状皮肤起先缩成一个样子像真菌的孢子，跟着颜色转黄，转棕，最后那块皮肤硬得像块牛皮。尽管约阿契姆担心他的皮肤病，但他并没跟他的女儿透露这事。

有时候，朱莉娅以为她爸爸真的要变成一只蘑菇了。他肚子上那块硬皮随着月潮而改变颜色。这块肚子上的牛皮成了浓郁的深棕色，但在一个月中的某些时辰，她在夜里醒来时，会发现他那块皮泛出彩虹般的桔黄色，或者有棕色斑点的淡黄色。早上，如果他身体好到能够整理稿件时，她悄悄地看一眼墙上那些霉菌，就会发现它们也变了色。就这样，约阿契姆的病和房屋墙上那些潮湿的生长物互相秘密地监视着对方。

每到雨季，房子就要更深地陷入朽烂。青苔爬上了窗框，



灰白水龙骨从外面墙上钻出来，树叶和悬垂的树枝落到屋顶上时，就在那儿腐烂，成了下一代细菌生长的丰富的肥料堆。一株长着闪光椭圆形树叶的小针叶树从阳台上长出来，树根挂在锈蚀铁屋顶的破洞外面，谁要是傻到在黑地里走过阳台，就会被那树根扫到脸上。一天下午，就是在这些缠绕成一团团的树根上，有一条绿色的树蛇开始舒展了身子，当时，朱莉娅独自坐在一把柳条椅里，正在看《金库诗选》，听她父亲和一个女人在遮暗的房里作爱的呻吟声。

她全身的肌肉都收紧了。她等着那条蛇自然地从中消失，再度成为一络无害的树根。她注视着蛇的尖利的眼睛和那张冷静的爬行动物的嘴巴，绿蛇弓起背来，穿过空中朝着她把身子摆得更低了。

几小时后，父亲终于找到了她，这时，她陷在地洞里看上去已经半死不活了。地洞周围的地板烂得厉害，约阿契姆困难的跪在那儿，把膀子伸下去抱他女儿像抱一捆脏兮兮的东西时，他自己的膝盖顶穿了木板，幸好没掉进阳台下那个坑里。他一直叫着她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地叫着，还用德语骂人。由于他的一声声叫喊，那个婊子从房中黑暗的深处跑了出来，身上还披着一件红色的居家便服呢。

约阿契姆从棚子里拿来一把铁撬棍，把烂板子都撬开，撬出一个地方来，好让自己下去。土鳖在暗处纷纷跳着。地下到处是无名、也叫不出名字的昆虫，奇怪的杂种和变异的千足虫，水蛭已经舒舒服服地钻进她的嘴巴和耳朵里了。约阿契姆不敢看她撕破的衣服下面，怕在那儿找到生命的形式。



他把孩子抱进屋后,怎么也没法使她苏醒,无论是用挥发盐,还是在她额上敷冷毛巾和热毛巾。在太阳穴上加冰和用力打她耳光,都不能在她身上产生任何苏醒的迹象。

约阿契姆和镇里来的那个女人一整夜都守着朱莉娅。到第二天早上时,女孩子“缓过气来”。黎明时分,朱莉娅继续在呼吸,约阿契姆松了一口气,他不必走 12 英里的路到小港镇上去找帕金斯大夫了。夜里,他从女人那儿得知,朱莉娅怀了孩子。

朱莉娅怕蛇怕到这样一种地步,她拒绝触摸哪怕是最微小、最无害的物体。如果要她把橡皮门垫拾起来,都会太过分,因为她害怕那种材料的冷血性质。有时候,衣帽架上挂的一只女式手套会突然充满活力,向她移动过来。细绳或粗绳干燥的质地也会引起震颤和呕吐的发作。甚至连父亲用来系晨衣的红丝带子也不得不藏在一只抽屉里,因为它有一种很凉的液体的滑溜感觉,在某种角度的光线下,朱莉娅会觉得它在朝她移动。

她坐着时,常背对爸爸弃置不用的实验室里盛着用甲醇变性的酒精的大罐子中的那堆细绳子。在大房间里,墙上的油漆直往下剥落,所有物体的表面都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不过,当她知道父亲不会突然发现她,她可以安全地从他挂在卧室椅子上的马甲里取出钥匙,坐在暗淡的空气里,呼吸着所有那些化学品的气味时,她还会不时地溜到里面去。

那个遥远的下午叫床声把朱莉娅从睡梦中惊醒,使她把



眼睛凑到门上去的那个女人是个道地的意大利妓女，名叫蒂娜·特丽娜。第一次造访后，她便定期坐火车从曼姆到北边来，每次都要跟鸭河那个不幸的“professori”（意大利语：教授——译注）呆上几天，这当然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第一天的那个下午，女孩子过得很快活。她以为父亲把那个不速之客弄痛了，而且很快就要送她坐星期天的火车走了。但从另一方面上来说，蒂娜·特丽娜又使她着迷。她把她的嘴巴画成一个大红心形，她衬衣里露出的光光的棕色膀子上戴着金手镯。蒂娜·特丽娜穿上连衣裙时好像总是感到不舒服。她总是往下看她的胸脯，试图拂去想像中的一团绒毛。

下午晚些时候，在黑暗的、空气不流通的房里跟那个皮肤溃烂的男人成小时地做爱之后，他们会把女孩带到河边洗澡。在第一个这样的下午，朱莉娅看见蒂娜·特丽娜没有穿游泳衣。她径直从轻便马车里跑出来，穿过桉树林，跑到鸭河那一大片绿色河水的边缘，就开始脱衣服。朱莉娅看着那女人脱光衣服，看见她丰满的棕色乳头，有肉窝的大腿，脂肪层层叠叠的大白屁股……蒂娜·特丽娜把拖在背后的长辫子松开，推开水进入河中，在河面上厚厚一层的绿色浮沬几乎都没有泛起微澜。跟着，女孩子又看着她父亲脱光衣服，裸露出那身难看的皮肤，跟在女人后面下水了。

朱莉娅穿着气球般鼓起来的棉织上衣坐在河岸边，看着两个身影在戏水。她的脸上仍然带着哑巴那种稍稍显得莫名其妙的表情。她怎么能跟这样一副成熟的肉体竞争呢？她只有平滑的暗色的奶头，小小的隆起的腹部长得又那样小。她

对那女人俗气的母性美感到震惊。就连朱莉娅都想把她的脸依偎在蒂娜松弛的肚皮上，把她的嘴巴往那两个硕大而松软的乳房凑拢过去。

蒂娜·特丽娜来访得更加频繁了，占用了约阿契姆越来越多的时间。他再也不把一整天花在床上。他生病期间把那篇专题文章撂在了一边，但健康的逐渐恢复却没有再点燃他对该文的兴趣。他盼着蒂娜的造访给他带来轻松，盼着坐轻便马车到火车站去看她穿着花哨的衣服顺着平台跑过来，边跑边把那只纸箱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里。

她常常穿着她那身俗艳的连衣裙，戴着俗艳的帽子从曼姆乘火车到达车站，但在接下去的几天里，她的衣裙会逐渐减少，最后她在房里来来去去就穿一条内裤，那对茶色的巨乳边走边晃动着。有几个下午，在长长的做爱之后，她干脆一丝不挂地在房里走动。

还有一点别的什么，一种赎罪的意味：蒂娜·特丽娜在约阿契姆的身上不经意地开发出了只知给予而不计回报的乐趣。一次，她正离开车站，他已经把一卷破旧的一镑钞票塞进她手里。她出于习惯点了点数，但跟着，她冲动地把钞票又塞回到约阿契姆的手里，态度是那样坚决似乎不容他跟她争辩。男人脸上闪现出感激的光彩，那光彩在他那儿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她的一次造访之后，他在床单和床褥上找到她金项链上的一个金十字架。他把那东西戴在自己身上，沉甸甸的金子刮擦着他胸脯上得病的皮肤，打算她下次来时还给她。她



要他把它作为礼物留下，因此他再也没把它取下来了。他对蒂娜·特丽娜忠心耿耿起来，性交在他们之间每重复一次，那种感激就会加强一次。对约阿契姆来说，如果火车站上那一个时间包含的因素没有使他皈依宗教的话，很可能会促成他再婚。一天，他在曼姆的妓院过夜，陪着蒂娜到天主教堂，对那个有女人气的爱尔兰牧师忏悔了他的罪恶，从此便自称是天主教徒。

朱莉娅一想到要跟别人分享她的父亲，就感到惊慌失措，尽管他现在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她发生肉体上的接触。有些秘密还是得要守住，不能让任何不速之客知道。当她从门缝的有利地位看见约阿契姆把其中某些秘密告诉蒂娜·特丽娜时，她感到不安。

蒂娜·特丽娜在这座衰朽的房子里又添加了她自己身上与众不同的气味，因此，她造访之后过了很多天，朱莉娅还以为蒂娜·特丽娜在那儿。再怎么敞开窗户透气，也没法驱除那女人留下的种种水果气味和蒂娜·特丽娜在曼姆的店里成袋买来的蜜饯味。朱莉娅如果帮她做了什么事，她就会还她的情，每次都很勉强地发她一袋，把她腐烂的口臭味掩藏起来。

一天下午，朱莉娅发现她在约阿契姆的卧室里盯着看那些书籍，它们几个月前就被散放在地板上了。她茫然不解地看着那些奇怪的字体，惊叹他画的珊瑚虫的素描和水彩之美。朱莉娅走进屋，在她身边坐下，重又进入了她童年曾经生活过的那个珊瑚虫的世界。又有一天下午，朱莉娅发现她站在约阿契姆卧室的一面镜子前，正往身上抹香油，既是为了遮蔽她身上的气味，也是为了润滑她那已经变成棕色，长满鳞斑的皮



肤,以致有时候看上去,她的皮肤就像遍布着蛛网。只是到了后来,当蒂娜·特丽娜身上也发出跟她父亲一样的发酵气味时,女孩子这才意识到,蒂娜·特丽娜也染上了约阿契姆的皮肤病。

一天夜里,父亲跟蒂娜到曼姆去了,朱莉娅独自坐在阳台上,蛾子从四面八方扑打着她的脸。这些蛾子又白又大,就像从海洋上吹来的那些盲目而难看的鸟。朱莉娅突然被一种预感攫住,觉得约阿契姆再也不会回来了。风开始刮过桉树。

她哭了起来,耳朵里有一种干燥的咝咝声,好像来自她的体外,来自花园的某个地方。“爸爸。”那声音叫道。蛾子感觉到她的恐惧,便把攻击的强度加大了一倍。朱莉娅以前从不在乎蛾子,可此时,她心里越害怕,那群围着煤油灯旋转的蛾子用翅膀扇击她的速度就越快。她愤怒地抓住一只蛾子,罩在双手中,小心翼翼地把翅膀从蛾子谷壳一样干燥的身体上扯下来。其他的蛾子都朝灯光扑上来,过了几分钟,她才猛然想起应该把灯芯灭掉。蛾子都飞走了,朱莉娅孤零零地留在那儿,黑地里,夜的噪音成倍地增强,她又哭了起来,哭声简单而有力,就像任何孩子一样。“爸爸,爸爸!”她哭着。这几个字奇迹般地又一次在她的口里形成。从此以后在她的余生中,她只要哭,就会感到手指间好像捏着蛾子棉花一样的翅膀。

每年这个时候起风暴是常有的事。风暴来时,光线中有一种很别致的特征和一种绝对的宁静,所有的鸟儿都消失了。男人们在码头上缩成一团,把渔船固定起来,神情紧张地眺望着大海,等待着夏洛特岛上的棕榈树开始弯下腰来。



可这场风暴在头天夜里就已经刮起来了。约阿契姆看着大陆饭店的窗外,穿过瓢泼大雨,看见一条混浊的河流流过街道。雨锤击着铁皮屋顶的声音如此响亮,他不得不把身子俯过去,对着蒂娜·特丽娜的耳朵里大声喊着,才能让她听见他说的话。

第二天早上洪水猛涨,饭店的客人不得不爬上楼梯来到二楼上,扶着阳台上的栏杆。他们对街上划船的人大声叫着,好让他们知道他们很安全。就在这时,约阿契姆大吃一惊,看见他女儿坐在他多年来一直泊在鸭河那座小凸伸码头边的木舟上一冲而过。

一群小鸚鵡掠过暗色的水面,正从朱莉娅的头顶飞过。她扬手蒙住了脸。那群鸟呈鲜亮的梅红色,绿色和蓝色,快速地穿过雨中的尤加利树飞走了。

河岸边的河草已经被洪水淹没。雨增加了速度,打得她睁不开眼睛,此时,船只能身不由己地跟着水流跑,撞在浮动的木头和动物尸体上。

她仰面朝天躺着,身边传来持续不断的水流冲击声和旧船板的挣扎声,仿佛都成了她自己的呼吸声。河流穿过风的隧道,冲进前面的黑暗之中。跟着,船被抛在坚固的水墙上,她觉得好像船翻了两个跟头。

折断的树梢从水面戳出来,当风力减小,太阳出来了一会儿时,朱莉娅发现她自己来到了一个有光线的绿色洞穴里。她看见一株倒下来的潮湿而灰色的树干突然十分靠近她的脸颊,感到那空穴撞了一下她的头骨,光线就消失了。就在水下,有一些看不见的手指在摸她的腿。她慢了下来,接着停住



了,与此同时,浮渣继续从她身边一冲而过。芦苇抽打着她,那张缠住她的渔网此时收紧了。

时间过去了,声音从人世朝朱莉娅传来。一只狗吠了一声。一只癞蛤蟆在她视线的边缘鼓起肚子。朱莉娅紧紧地眯起眼睛,等那东西消失,但当她重新睁开眼睛时,却有一张男人的脸很近地靠着她自己的脸。他脸上没胡子,他的头发比燕麦还要白。他有一对蓝眼睛,眼睫毛是淡色的,穿着一件带白色圆领的黑色无袖马甲。他身体下部呈橡皮状,闪闪发光,像鱼一样。这时,他做了一件让她吓破胆的事情:他张开嘴巴,大笑声从里面滚了出来。

发生了一场非同小可的犯罪案。爱德华国王在曼姆火车站站长办公室的墙上注视着朱莉娅。她正躺在角落一张野营担架上,手放在她隆起的腹部上。那儿,在她头顶的墙上,那个胡子长得跟她父亲一模一样的人正注视着她。国王会从墙上下来,走到她这边来,面带微笑,蓄着胡子,穿着制服,佩着宝剑和皇室的蓝饰带,蓝色的眼睛不离她的眼睛,给她宽衣解带吗?但那是火车站长在笨手笨脚地脱衣服,把他长长的贴身羊毛内衣脱到大腿根上。他的脸因用力脱鞋而憋得通红,他三天未刮的髭须使他显得样子很凶。他把手伸到她下面,完事后,便从有脚轮的矮床上爬起来,朝挂着国王画像的墙转过身去,大笑起来。他就在那儿坚决地扣上了裤子扣。

炖鸡肉的香味儿逐渐充满了房间,朱莉娅意识到她快饿



死了。她身上裹了一件灰毯子，走过房间，静静地打开了门。打扮得像个牧师的人把穿黑衣的脊背对着她，正在木炉子上一只罐子里搅动着。他把她吓了一跳，身子也不转过来就说：“我一直在想，不知你什么时候会进来呢。”

他终于把脸转过来对着她时，她为他脸上的慈祥表情而感到震惊。牧师似乎不为她的凝视而动。他笨手笨脚地把烟斗放在潮湿的嘴巴一角说：“我爱钓鱼。我酷爱钓鱼。起风暴前我就下了网。”他环视着那间阴沉的小厨房想找一盒火柴，突然又把背对着她，微笑起来：“亲爱的，”他说，“上帝告诉我，他要送我一个妻子。”



3

威利·帕瑞戴斯逢年过节有个习惯,喜欢在花园安排放烟火。他打定主意,尽管朱莉娅有病,也要在她今年生日这天,把烟火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隆重。霍托是村里专做传统烟花的手艺人,每逢村里过节,总是他计划并施放烟火,今年这事又由他主管。那天一大早,霍先生就在传教团玫瑰园一侧把冲天炮绑在一排削尖的竹桩子上。他把罗马火炬和轮转烟火固定在阳台栏杆上的木板上,同时在住地指定地点把俗称“汤姆-汤姆”的少量火药掩饰起来,这些东西闷闷的砰击声会把土坷垃炸得满天飞。他还在阳台上摆了一些要用



手摔的五花八门的炮种：大小各异，力量各异的鞭炮，能发嘶声的烟火，火炬和花炮，颜色应有尽有，还有这位手艺人做的独一无二的爆竹，村民们都给这些爆竹起名叫彗星，太阳，月亮和星星。这些鞭炮成百上千地堆成一堆，是几个月来用手精心制作，小心翼翼地往里面灌上硝酸钾，然后包上发光红纸，红色是中国人的喜庆之色。霍托用打上他自己标记的“星星”制作了他的这些火箭，弹壳和罗马蜡烛，火箭爆炸时，天空变得五彩缤纷。他制备了常规的白火，用氯化钾，以及镁光，锗红，钡绿，钠黄和铜蓝等做的 gerbes(花束)和喷泉。

花园里，在从阳台可以清楚看见的地方，霍先生花了一下午时间布置烟火燃放的主要道具，这是威利·帕瑞戴斯亲自设计的。烟火周边有瀑布和“树”，那是树干和树枝形火焰，冲上夜空后会停留在那儿。在正中央至尊的位置上，霍先生搭了一个架子，绑上可以像轮子一样作横向和纵向移动的爆竹。而在木格子架的竹竿上，帕瑞戴斯的惊世之作将显露无遗：一面英国国旗图案将成矛状色彩显现出来。

艾雅司从上海搭乘下午两点的火车到达当地火车站时，朱莉娅正坐在绿色的小轿车里等着接他。艾雅司马上就在猜想，不知邀请他来庆祝她 31 岁生日的后面还有谁。邀请书是牧师亲笔写的，这是一份简短而正式的便条，上面简述了当晚拟议的活动，艾雅司也给以同样正式的回复。

朱莉娅在杭州过了一周后刚刚回到教会学校。她在杭州住的是一家英国人开的俯瞰着西湖的饭店，有一个传教团的女士照看着她，那人名叫格蒂尔德·普拉兹。当然，艾雅司早



就知道这一切。朱莉娅本人在两周前就曾为此事找过他，当时她刚刚结束了他们每星期二下午的定期约会，正在穿衣服。当时她说，威利是否允许她去杭州，要取决于艾雅司是否认为这次旅行不会对她身体有害，而且也不会干扰艾雅司为她安排的治疗计划，这项计划似乎一直进行得十分成功。艾雅司看得出来，这次旅行对她来说意义重大。

到杭州坐火车要走 110 英里，那是一个坐落在天目山脚，湖上风景很可爱的地方。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艾雅司认为，换换环境可能会对朱莉娅有好处，使她提起精神来。她要去那儿的最大危险在于，任何不必要的激动都会过度地刺激她那衰弱的神经系统，在远离家人和亲友的地方，使她再次躁狂起来，猛然跌入歇斯底里的崩溃状态。如果她错过定期向艾雅司摔掉思想包袱的机会，她的那些幻象可能又会在她脑子里堆积起来。不过，他在给威利的一张便条中允许她去，条件是她必须坐头等车厢，住好饭店，她的德国朋友必须保证让她避免各种刺激，而且必须继续在休息时注射五谷（谷是英美最小重量单位，每谷为 64.8 毫克——译注）吗啡。答应办到这一切时，朱莉娅才去度假。星期四，艾雅司收到一张西湖的明信片，反面用她通常那种狂猛的笔迹写道：“亲爱的大夫，特从湖山之地向你致以问候！太棒了，真让人兴奋！可吃惊呐！我在这儿完全治愈了动物的痛苦！朱莉娅·帕瑞戴斯。”可现在，不过两天，她却坐在她丈夫轿车的方向盘后。

艾雅司和朱莉娅的车从车站沿土路而去。这条路坑坑洼洼，轧出了车辙。车子只能慢慢地走。他们穿过一个有小农



庄的地区。那儿绿野葱茏，景色迷人，整条河的流域仿佛一张农作物和植被交织的绿色地毯。

朱莉娅平静地坐在威利的小轿车的方向盘后。她好像没有平时紧张，而是很放松，这显得不自然，也不是她的特点，因此不大令人相信。他想，也许她只不过是给他留个好印象，以证明假期的效果吧。在城里她脸上总是出现的那种紧张表情已经消失，露出了微笑。听到艾雅司随便说的一句什么时，她甚至还笑出了声。他俩一起来到户外，离开他黑暗的房间和床铺，与朱莉娅在空气不流通的地方成小时地交谈，使艾雅司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他伸出指头顺着她的肩头往下摸，那肩头像儿童一样纤巧。与此同时，那条河始终在远处流。

他们经过无数条小木桥，桥宽仅够一车通过，矮得贴近水面，他都能从引擎声里听见渠道中涨水的冲刷声。

他们走了将近半小时后，朱莉娅突然把车靠边停了下来。他们在河的拐弯处，峡谷在这儿变窄了，太阳下到处立着巨大的砾石。鹅卵石铺就的河岸陡峭地伸到混浊的受潮汐影响的河水中。她伸手去开门，跟着便从车里滑出来，开始半走半滑下那座陡峭的鹅卵石坡。艾雅司跟在她后面，他的皮靴把下面的小石子踩得横飞。

大约在两百码开外的地方，有一小组人在石头上干活。一些人在用长竹杆钓鱼，另一些人在涉水下网。尽管艾雅司从远处看不见渔网，但还是能够分辨出他们在干嘛。

艾雅司和朱莉娅长时间地伫立着看人钓鱼和眼前这片河水。她说：“你知道，这里有些东西我怎么也看不厌。我老是



在这儿看见美的东西，而我以前却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我的国家是那样丑陋。”她突然停住不讲了，愤怒地盯着看她的鞋子，好像把思想转换成文字要花气力，而她不耐烦这样做。跟着，她又变了，继续用生气勃勃的欢快的声音说：“你看见那边跟那个渔人在一起的那个人了吗——就是在第一块石头上的那个？戴帽子的那个？那就是威利呀。”艾雅司说他感到吃惊。

“他每个星期六都要到这里来跟他们钓鱼。另外几个人是我家的仆人和园丁。他每个星期六是必定要来的。他给他们大家都放半天假，好像他们都是英国人似的……”她的眼睛冒着怒火。

“今天下午厨师工作，他付他双份工资。今晚上家仆就要同样的报酬了。威利把他们都惯坏了。为了求得他们批准，他要手脚着地在他们面前爬——像虫子一样。他们肯定笑死他了！他对待他们——我不知道——好像他们能跟我们平起平坐似的。而且比这还要糟。我想他是想跟他们一样！”

艾雅司说：“你住的地方离这儿一定不远。”

她在她穿的羊毛衫兜里摸索了一会，掏出一盒英国“普莱耶牌”香烟，点燃一枝说：“不，一点都不远。”她继续看着河面，然后继续平静地说，“他总是到晚饭后才回家。她跟他们家的人在村庄里吃饭。”

“他们没人住在教会学校吗？”

听到这话她大笑起来：“我上星期在杭州时有几个当兵的到这儿来过，把他们都吓跑了。现在，女孩子也都得回家了。他妈的国民党士兵现在都睡在校舍里了。”



“那你丈夫干吗不投诉呢？他肯定有认识的人的。我自己就认识大使馆的一秘。”

“威利说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赢得民心，而不是为了夺得民心。你应该听他讲些什么，你会以为他本人就是国民党党员呢。”在这场感情的爆发中，她脸色完全变了。一种极度难过的表情攫住了她。她眼神阴森森的，嘴唇薄薄的，鄙夷地露出微笑，嘴唇缩回来，露出牙齿，她拿着香烟的手在颤抖。她说（声音跟以前一样尖刻）：“我从没见过像他那样热爱中国人的人。可怜的威利呀。他太相信他的工作了。”

艾雅司又看了看远处那个身影，已跟周围那些身影没有区别。太阳照在河面上。这景色中有一种宁静的气氛，是20英里开外的城里不可想像的，那儿罢工频仍，游行队伍的前锋出现在街尾时，外滩的气氛就会突然改变。你还没看见人，就会先听见声音，跟着，外滩上就满是成千上万的中国罢工工人。枪声，次日黎明就会恐怖地发现路灯柱上吊着人，接着是数日不安的休战，看起来好像罢工可能会中断，跟着，长江上巡航的英美炮舰泊在了苏州河上——这一切在当时似乎比20英里还要遥远，水面上照着阳光的那一刻，艾雅司在去小小的女子教会学校的路上，星期六下午的那一个时刻。

从外面看，教会学校好像是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儿们度过青春期的一个幸福而阳光灿烂的地方，一点也不像艾雅司还是一个胖小子时生活过得惨兮兮的爱丁堡那个地牢一样暗无天日的公立学校。艾雅司没看见一个士兵：他们只是晚上才回到这儿来睡觉。这个小小的教会学校有木制和拉毛水



泥制的建筑物，一幢幢有游廊的平房散布在宽大的，管理得很好的花园中间，一排排树和一行行玫瑰花栽种得整整齐齐，比艾雅司从前学校的英国味还要浓，跟威利在玫瑰园中散步时，艾雅司又一次突然想到，他跟上海的罢工和游行恍若隔世。最主要的是，这地方似乎太宁静，太田园牧歌了，根本不适合把一排国民党军官在向上海进发的最后阶段，安排在这儿住。

威利·帕瑞戴斯的书房看起来更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解剖标本室，而不像传教团牧师写星期日布道词的地方。三面墙壁上摆满了他从澳大利亚随船带来的科学书籍。房间中央有一张大松木桌，他的科学研究用具都摊开放在桌上。

威利·帕瑞戴斯牧师很高兴地让医生这位在名义上是他在科学方面的兄弟看他珍藏的德国显微镜，他的一盘盘贴着整齐标签的蝴蝶和昆虫标本，以及他里面有鸟类图画的大皮夹子，每只鸟都是用水彩在他从城里手艺人那儿买来的昂贵的手制纸上煞费苦心描绘出来的。

他让艾雅司看他装满了当地岩石标本的抽屉，以及刚开了头的字迹参差不齐的手稿，他想以后退休回家时再自费出版这部手稿——这是一部关于太平洋珊瑚礁形成的优秀而有份量的专论。

艾雅司打定主意，要问这个人一些问题，几个星期以来，这些问题一直在他心头萦绕不去，像朱莉娅的那些蛇一样。他先问威利和朱莉娅第一次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这个问题好像使牧师先生吃了一惊。他微微一笑，犹豫片刻，把烟斗潮湿的烟嘴举向唇边：“事实上，是在布里斯班的一次舞会上，”他说，“顺便说一下，我相信，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她的短假是



一个成功吧。她看上去的确更精神了。”

“好像吧。”

“我就说嘛……”他的话逐渐没了，他把烟斗从嘴中拔出，细看了一下。接着他用淡蓝色的眼睛平静地回看了看他的客人，“我得说，艾雅司，我庆祝的这天选了一个不吉利的日子。这一切都在发生。还会持续多久呢，你认为？”

“这你比我清楚。”

“可罢工呀，艾雅司。人民搞斗争呀。你不就在现场吗？你们俱乐部的人怎么说？”

“还不是他们常说的那一套，我想。喜欢预言灾难的人和喜欢舞刀弄枪的人常说的那些话都搅在一起了。你听没听说，领事馆要把属于英国臣民的所有传教士都从内地召回？”

“听说了。”

“看样子，有些人拒绝到港市来。”

“我们离上海够近的了，用不着担太多的心。”

“是哎，可别的人呢。我看他们没多少机会了。拳民又要闹起来了。他们在俱乐部就是这样说的。尽管我对这种事情中的政治因素兴趣并不大。”

“当然呐。”

他们在沉默中坐了几分钟，跟着，艾雅司说：

“那个跟你太太一起到杭州去的德国女士，她也是在这儿教书的传教士吗？”

“普拉兹小姐吗？怎么了，是呀。”

“你注没注意，她俩单独在一起时，讲德语还是英语？”

“当然讲英语喽。说实话，普拉兹小姐的英文比你我都



好。她是在英国受的教育。牛津大学索默维尔学院。”

“是的，不过我是说——朱莉娅的父亲是德国人，对不对？”

“但她不会说德语！她母亲是英国人。我们在澳大利亚讲的就是那种语言！你总不能去注意她在病中说的胡话吧。”

“我想问你一个完全是关于她病情的问题。你的回答可能有助于她完全恢复健康。然而，这是一个私人问题，一个你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回答就不必回答的问题。”艾雅司也在装他的烟斗。此时他点燃烟斗，把浓重的散发甜香的烟草味吸进肺里，觉得心跳得很快。他继续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敞开来谈了，“你们结婚时，你妻子是处女吗？”

威利·帕瑞戴斯眼睛看着别处。他的目光滑过装昆虫的玻璃盘，它们胸廓的干燥外壳被针别在托板上，然后又滑到房间的第四面墙上，墙上有各种各样颜色鲜艳的鸟类标本：巨嘴鸟，长尾小鹦鹉，彩虹鸟，云雀，山雀，鸣禽，白脖儿和带条纹的蜜雀。他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了一会儿鸟，好像他听错了，需要这些鸟来帮助。终于他说：“卫理公会教堂不像圣公会和罗马教堂，是不坚持一定要圆房的。”

“对不起。我不大明白——”

“她是处女，艾雅司。她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们婚后从来没有在一起过。一次也没有。”威利·帕瑞戴斯把烟斗从嘴里取下，很有尊严地对艾雅司眨了眨眼。

艾雅司说：“跟我谈谈她父亲的事吧。你见过他吗？”

“我跟他很熟。”

“他人怎么样？”



“一个性格完全无可挑剔的人。”

“他还活着吗？”

“就我所知是这样。科尔家族的人都长寿。”

“科尔,你是说?”

“这是朱莉娅的姓。她父亲名叫约汉尼斯·科尔。”

“而不是约阿契姆吗?”

“当然不是。谁是约阿契姆呀?”

“他是一个农夫?在北昆士兰?可同时,他又是——我该怎样叫他呢——一个搞科学的人吗?”

“搞科学的人?!不是的。唔,从某方面来讲,他也是个搞科学的人吧。他是牙科医生,艾雅司。我要是显得不大明白你这些问题时,你可别太在意啊。”

艾雅司没理他,好像讲离了题一样继续道:“你能告诉我鸭河在澳大利亚什么地方吗?”

“恐怕不行。要是真有这个地方,那肯定很小。我可以告诉你,我是颇以热心研究我家乡的地理而自豪的。”

“你也从没听说过一个名叫曼姆的海边小镇吗?我说对了吗?”

“相当不错。”威利·帕瑞戴斯平静地点点头说,“但你最好解释一下你问这些问题是什么意思。”

艾雅司耸耸肩膀。他突然感到实在太累了。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了。他张开嘴巴,听见自己仿佛脱离了肉体的声音。“帕瑞戴斯先生,你对天文学感兴趣吗?”

牧师听到这个问题似乎松了一口气。他对他露出微笑,粉红色的额头发亮:“那当然呀。可你怎么知道的呢?我



妻子一定告诉你了。实际上,我们在后花园里自己建造了一座相当精致的小天文台。我们鼓励学生对科学发生兴趣。天文望远镜只有六英寸长,但是能够查找彗星。彗星观察镜一般都很小,镜头直径和焦距长度之比需要较大。这是因为彗星光很散漫,表面亮度较低。望远镜是德国造,但赤道装置却是美国货。啊,我在那儿度过了多少个夜晚呀,横扫长空,查看星象图。我可以告诉你,我所见到的异常星象消息有一两次发表在本地和国外的科学杂志上了。不过,尚未发现帕瑞戴斯彗星。反正还没有。也许总有一天会发现的吧!事实上,我对我们小天文台已经自豪得有点儿过度了。希望能带你去看这座天文台!”

时已黄昏,月亮初升。艾雅司站在他房间的窗边。从楼上这个有利位置,他可以看见教会学校校园那边翠绿的山谷,渠道,一座村庄摇摇欲坠的石制建筑物,以及借着夕阳最后的红光,远处看似湖水边缘,实则河水近岸的东西。楼下是英国式草坪,英国树,以及邻接车道一边的玫瑰园,那儿,一个孤零零的园丁仍在干活。在小道构成的图案中心,有一座石泉,已部分坍塌了。园丁沿着玫瑰丛移动,俯身修剪锯断树枝,尽管他的窗户与玫瑰园隔着一段距离,尽管光线已经暗了下来,艾雅司还是能够分辨出来,园丁是位女性。她赤着足。她穿了一条男人穿的裤子,裤子上用皮带系了一条打包麻布袋,像围裙一样,还穿了一件马甲,一件有条纹的无领衬衫,衬衫袖子直卷到二头肌上。此时她正在他的下面,在井边用手泵打水,因此他可以看见她的手臂和肩膀上肌肉突露的样子。她把铁



桶的水提回到她刚才干活的地方，不时停下来往一朵朵玫瑰花枝上浇水。

艾雅司往后一退，把巴里纱窗帘放了下来。他这样做时，一眼瞅见他在梳妆台上镜子中的影像。他的脸很暗，他自己脸上的表情从他身上隐去了。他朝他的大提箱走过去，提箱就放在矮矮的一排抽屉顶上面，他从箱子旁边的救护包里拿出一个鲜蓝色的小药瓶，瓶子包在一团废棉球里，放在箱子的一个隔间中。他把瓶塞拔掉，举到鼻孔边，好像是一瓶给人闻的科隆香水，从里面抿了一口，又把瓶塞塞上，放回隔间里，锁好药包，把钥匙装回到马甲兜里。他在窄床的边上坐下来，盯着窗户。他想起了朱莉娅·帕瑞戴斯，以及她在他小道上撒下的网，如此随便，又如此准确：暗示是编造出来的，丝织一样编织的叙述使他糊涂，整个童年都悬挂在空中。和衣躺在床上，艾雅司成了一个梦，朱莉娅的故事是一个梦：那不过是吸食鸦片的另一种方式罢了。

后来，天色相当晦暗时，这四个欧洲人聚集在阳台上观看放烟花。

村里来的人毕恭毕敬地站在草坪四周，尽管更爱冒险的男孩子们为了看得更清楚而爬上了树。

爆竹响第一声时，身穿国民党军队草绿色制服的一队士兵从教会学校后面的校舍里走出来。他们没戴帽子，制服扣子敞开没扣。他们一直在喝米酒，显得好像被突然碰到的喧哗声弄得茫然不知所措。两个士兵进屋拿枪，好像怀疑有人在用火炮进攻了。当这些士兵打消了疑虑，发现一切并无恶意时，才跟大家一起乐起来，高声喊叫，哈哈大笑，还往空中打



了几梭子弹。

但当英国国旗在亮光下展开，咝咝作响地闪耀着绚烂的色彩时，他们的情绪改变了。有人在大喊大叫，做着愤怒的手势，其中两个人开始有条有理地用枪托砸校舍的窗户。帕瑞戴斯牧师看了一会，好像想下去跟他们讲话，但朱莉娅抓住他的膀子，并紧抓住不肯放手，并把他们都领进了屋里。

从餐厅还可以听见冲天炮仿佛俯冲一样的哨响。这是个很小的房间，几乎放满了桌椅板凳，一盏灯光在他们脸上投下了一重强烈的黄光，使人人看上去都像有病一样。艾雅司发现他就坐在早先他在花园里观察到的那个女人对面。

普拉兹小姐身上无一处不像一个学校教师：大个子女人，身穿不时髦的黑衣，肩膀挺得笔直。她有一个高而显贵的鼻子，她的眼睛看东西的方式表现出绝对的信心。由于她虽然相貌平凡，但却光彩焕然，就连她的盆形发式也是这样，她的脸使他想起了圣女贞德。

一盘蒸锅出现了，男仆消失，威利开始作感恩祷告。艾雅司低下头，但并未闭上眼睛。他注视着朱莉娅身穿一件褴褛不堪的羊毛衫坐在桌子的端首。她根本没花一点气力为这个节日打扮穿衣，脸上不施脂粉，也没涂口红，头发没梳，面色憔悴，显得十分疲劳。威利穿着平时穿的牧师衣领，而艾雅司身穿晚礼服，戴着黑领带，感到十分显眼。用餐过程中，朱莉娅可人极了，尽管带点儿试探性，不很有把握的样子。丈夫问她是否欣赏烟火，她对着下面她的双手微笑了一下，迅速地点了点头。她激动得很不自然，当她转过头来时，艾雅司看见她喉咙上青筋毕露。



威利帮她撕开了艾雅司送她的一本摩洛哥相集的包装纸,又帮她撕开了他自己送她的礼物的包装纸,那是一本美观大方的柯勒律治诗集。她翻阅着这本薄薄的集子,找到她要找的那一页,然后“砰”地把书合上,好像害怕流露出快乐的表情。普拉兹小姐看样子没送礼物。

艾雅司很少说话。他对问他的问题只回答一两个字,“哼哼哈哈”的,鼓励威利继续讲下去。艾雅司似乎是他们中间最轻松的人,他双肘支在桌上,露出衬衣袖口,蓄着络腮胡子的面颊托在掌心。威利或普拉兹说话时,他的眼睛就停留在他们身上,不时点头表示他在跟着听。他注视着朱莉娅越来越躁动不安。她的痉挛重又开始了。偶尔,她大声把唾液吸进口里,或嗅着鼻子。她吃得很少,大家还没吃完,她就点燃了一支普莱耶牌香烟。

布丁端上来了,艾雅司喜欢吃甜食,因此特别感兴趣。这是一种浓郁的果酱布丁——对卫理公会教徒来说是一种过失,艾雅司想。桌上没摆葡萄酒。松糕上有一层隔一层的肥肥的黄色牛奶蛋糊,带杏仁的蜜饯和搅奶油,所有这些东西都浮游在由葡萄酒和另一种糖浆组成的调味汁里,那是一种清澈的焦糖色的溶液,从中无法寻找到特殊的成分,它是最好的松糕自动形成的(也许是靠炼金术形成的吧,但艾雅司反正不知道)。味道很棒,艾雅司很高兴地又吃了一客。一只蛋糕端了上来,上面插着 31 根燃烧的蜡烛。唱过生日之歌后,威利提议用闪闪发光的姜汁啤酒为国王祝酒。他用切黄油的刀子叮当地敲着水晶玻璃杯,三个人都站了起来。普拉兹小姐执拗地坐着不动。“难道我们不能够表示一点爱国之心吗?”威



利好意地责备她道。

“我知道爱国主义会把人引向何处。”她说。她用的是慢吞吞的牛津口音，这口音配上她稍带德国腔的口音，听起来总不免让人觉得她倨傲不恭。

祝酒过后，在没有白兰地和葡萄酒的情况下，朱莉娅和普拉兹小姐干坐着，艾雅司给威利递了一根雪茄。

威利对普拉兹小姐来回晃动着一根手指：“可你自己也是个爱国主义者呢，亲爱的。你曾反对你的同胞参战。”他样子很放纵地在撩逗她，他拿着大哈瓦那雪茄做着手势，使他夸张的神态显得更加夸张。他做主人远不如当受害者那样招艾雅司的喜欢。

“我是反对过战争，”她平静地指出道，“如果基督真在我们大家心中，他会把我们都变成国际主义者的。”

威利牧师看起来好像受了伤害：“上帝让人人都成为兄弟。”

“可你在花园放烟火时却做了一面大英帝国的国旗！要不是你那面英国国旗，我们校舍的窗户肯定还完好无损！”

这时，艾雅司感兴趣了。他看看威利，他张开嘴巴，皱了皱眉头，好像不大明白她说的什么，又看看那女人。她坐着，脸上怒气未消，感到她处在有利地位，但还不确定是否要再讲下去。艾雅司估计两个传教士发生意见分歧可能不是第一次了。

“那你简直就是另一种爱国主义了，”威利说。他狡猾地问道，“你支持国民党的目标，对不对？”

“目前需要的是朝气蓬勃的中国民族主义。”她正要细讲，



但好像又改变了主意,坐了回去。

朱莉娅很凶地注视着他们。她的小脑袋急速地转向她丈夫,又转到那女人身上,接着又转回来。

“我来跟你讲讲什么叫爱国主义吧,”普拉兹小姐和颜悦色地对威利说,“1916年的时候,我就失去了我的爱国热情,当时学校把我开除了,我连学位都没拿到。”

三人等着她继续讲下去。“战时的牛津是个很安静的地方。你讲什么爱国主义——所有的年轻男人都参军了。聪明的小伙子,才华横溢的小伙子,18岁,19岁,他们都还是孩子呀。可我不是孩子。我23岁了。各个学院差不多都空无一人。城里有兵营和医院。我尽我所能为战争作了努力。我并不是想保持中立。我在一家医院自愿做护士工作。一天晚上,我在回家到学院去的路上遭人袭击。一群男孩子喝了酒。他们把我按在地上。骂的都是猜得出来的话。骂我是“博希”,德国兵,敌人。其中一个男孩子把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倒在我的头发上。你们知道松焦油吗?你们知道它闻起来是什么气味吗?我向当局投诉了。后来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调查。我的学院最后决定该走的是我。”

当她看见艾雅司在看她时,她的脸上突然出现了怀疑,几乎是恐怖的神情。她说的话已经超过了她需要的限度。艾雅司颓然倒进椅中,雪茄衔在嘴里,平静地说:“那一定是一段很痛苦的时光吧,普拉兹小姐。你一定觉得这件事很难启齿吧。”

她露出微笑,艾雅司看见她有一颗牙齿的边角有一个凹口:“完全不是这么回事,Doktor(医生)。”她以德国人的方式尊



称他，带有讽刺意味，使他感到不舒服，觉得她以某种隐晦的方式在智力上占了他的上风。部分原因是她是德国人。他脑子里滑过了一个模糊的想法，想问她一下她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的英雄，”威利·帕瑞戴斯对他说，“是蒂摩西·理查德。你们听说过他吗？”

艾雅司承认他没听说过。

“一个非常著名的传教士。中国人都叫他李提摩泰。他在学术界名声极大。当然，并非人人都能接受他的方法，而最不能接受他的就是我们那些较为传统的兄弟们。蒂摩西·理查德梦想中国能够自行改革，而不是成为一个外国教堂星罗棋布的国家。他在教学时力图强调中国文化的精髓。他在过去激励了许多年轻中国人参加革命运动。但他坚信，中国必须学习西方。他的生活贫困潦倒，只吃米饭和蔬菜，为的是省下钱来为他的学生购买望远镜和显微镜。可我们在这儿——瞧瞧我们——吃的是烤猪肉。”他看看艾雅司，好像这是他的过错似的。

“这餐饭很棒，”艾雅司说，“你见过这个叫蒂摩西·理查德的人吗？”

“可惜我一直没这个机会。他死于1919年。但他有影响，的确很有影响。现在我们有了新传教团，而且通过改革使他们的国民得到拯救。这就是蒂摩西的工作。社会福音，他们现在就是这么说的。”

“可外面那些士兵好像并不欣赏这一点。”艾雅司说。

朱莉娅大声说：“他们当然欣赏这一点啦。你难道没看见，他们把我们的窗户砸破时感到挺好玩吗？”



威利转身对艾雅司说：“你一定明白，从传统上讲，这个国家的传教士一向都是民族主义攻击的目标。我们在这儿要算极其走运的。一小撮士兵驻扎几天。我们的学生一两周内就会回来。有几扇窗户被砸破了。你要是听说过去对我们的人所犯的一些暴行，你会反胃的。”

朱莉娅说：“我们的女学生会回来的，如果琼尼·杨让她们的话。”

“他是谁？”艾雅司问道。

威利说：“本地区一个警察。一个像你所说的那样不欣赏我们的人。其实都是一些很小的事。偶尔某个女生的家里要她回去。他们签一个协议，但过了两三个月，就有人对他们施加压力，或者他们决定不让她们做基督徒，把她们赶走了。有时候他们派几个流氓地痞来把女生要回去。使我们情况很难办。他们也许会把女孩拐走，你哪知道呢。去年这事还真在一个女生身上发生了。而在其他时候，他们就派杨队长来要人。我不妨赶快补充一句，这是杨队长很喜欢做的工作。”威利·帕瑞戴斯顿了一顿，好像在决定是否继续讲下去。“他恨我们。极度憎恶我们。他认为他的神圣职责就是把所有的基督徒都赶出中国。”

“但干吗派警察来呢？干吗他们不直接亲自来把女孩子接回家去呢？”

威利·帕瑞戴斯耸耸肩膀道：“胆小怕事吧，我想。”

朱莉娅尖刻地说：“他们害怕威利会说服他们不这样做。威利很会——说服人。”

终于，这次派对结束了，艾雅司拖着身体上楼回到他的房



间。他脱掉鞋子和夹克,点燃他的烟斗,仰靠在床上。

一声高声的尖叫划破夜空。艾雅司一惊而醒,才记起他在什么地方。尖叫声消失了,此时,他听见外面花园里中国人激动的含混不清的讲话声以及另一种决不会弄错的声音:火焰的哔剥声。

艾雅司到达时,小小的木头校舍已经燃得很亮了。火焰把摇摇晃晃的明亮影子投在花园上。木片躺在草丛中燃烧,他听见铁制屋顶烧垮时发出的尖利撞击声和吱吱声。火焰跳跃着,烧着了垂挂的树枝。那些士兵根本不去救火。他们在帆布背包,被子和步枪中间缩成一团,兴趣盎然地袖手旁观。威利·帕瑞戴斯跑到水泵前,把那儿放的一只金属桶装满水,但火焰的热力太大,他无法接近火边,把水泼进火堆中去。

“所有的人都出来了吗?”艾雅司对他那边大叫道。威利看样子不明白,跟着听懂了,便转身用中文对那些士兵喊了一句什么。他们好像听不懂威利讲的中文。他们面面相觑,然后又看看威利,露出微笑。一个胡子开始四下蔓延的年轻士兵把一瓶白酒举向唇边,喝了一口,然后盯着火堆,把酒瓶传给站在他旁边的那个士兵。

一件事情使艾雅司抬眼看了一下。朱莉娅正站在一扇老虎窗边。她目光越过他,看着燃烧的校舍,她的脸在火焰光中显得兴高采烈。

半小时后,这幢建筑物就被烧成了一个黑忽忽的骷髅架子,上面冒着烟,燃着闷火,但还不肯倒下来。那些士兵已经拿着他们随身带的东西撤到那一排苗圃处,这排苗圃是在后



栅栏下偷工减料建成的。他们离开时，一个士兵——就是那个长着胡子的年轻士兵——把他的装具和背包拖到威利站的地方，一边道歉，一边把一样东西交给威利。艾雅司看见那是一个显微镜。

艾雅司回房时，威利仍然没有显出想离开那堆燃着闷火的废墟的意思。他继续站在那儿，毫不理会艾雅司向他道晚安，继续看着他学校留下的那堆余烬。

翌晨，艾雅司发现他还站在花园。他抬起头来，但什么也没说。看样子他一整晚上都没离开那个地方，他的双手，脸和牧师衣领被烟垢和灰土弄得脏污。

这幢建筑物成了一堆冰冷的黑色的瓦砾堆。夜里，烧焦的木架已有一部分倒塌下来，屋梁在烧剩的架子上危险地垂下来。草地上东一堆铁片，西一堆铁片，艾雅司审视着威利抢救出来的那堆烧得发黑的物体——一个铁桌框架，一只破洗脸盆，从一架烧坏了一部分的书橱上撒出去的烧毁的书。艾雅司绕着走时，脚把灰尘踢得扬了起来。

艾雅司说：“那些士兵跟你讲了什么吗？”

“他们今天一大早就走了。难道你没听见卡车开来的声音吗？”

“没有。”

“这是故意的。不可能有怀疑了。瞧瞧这儿吧。”他朝瓦砾堆那儿点点头。艾雅司起先不明白他的意思，跟着就看见一个烧得发黑的汽油罐，罐上商标微弱的红色迹印依稀可辨。

“这绝对是暴行，”艾雅司跟他说，“你必须立刻给领事发



一封电报。事不宜迟。我们必须把他们这事向他们的长官报告。”

威利·帕瑞戴斯甚至都懒得答理他。他好像陷入了一种黑色的绝望之中。艾雅司强烈地感到，这人恨他。跟着，牧师讲起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头天夜里几个年轻人讲给他听的：失火前不久，一个女人从传教团的屋里出来，朝屋后的水渠走去，她在那儿把停靠在小船台的一条小木船的绳子解开。那天夜晚气候温和，几个来看放烟火的农村小伙子在水渠由于放闸而留下一大片深潭的地方停留了一下。

沿河堤长了几棵柳树，其中一棵上面吊了一根绳子，在收割之后炎夏的下午，这些小伙子喜欢抓着这根绳子，把自己荡过水渠，一头扎进水里去玩。

那天晚上水流得很急，因为地方上的水管员把闸打开了。由于某种只有上海市政厅才知道的原因，水管员在夜里开闸往渠道放水泄洪。那几个小伙子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女人越来越快地沿渠道冲下去，在急流中看上去好像都没有挣扎。她平稳地划着船，而且划得很好（她曾经是萨摩维尔学院的女子八人划船队队员，威利指出），完全像是星期天出去荡舟一样，划的是他们放在上海跑马俱乐部带茶室的英国公园附近的一只船。几分钟后，柳树背后的天空满是火焰，传教团发出的叫喊声划破夜空。他们中间没人再去想那个女子了。在渠道中间，水流把她迅速地卷入黑暗之中，远离火光。

“你看见朱莉娅了吗？”艾雅司平静地问道。他的面部表情告诉他看见了。“她在——睡觉吗？”

“她现在正在睡觉。”



他说话的样子有点儿令人毛骨悚然。

“你什么意思？”艾雅司质问道。

“我跟她一起熬夜没睡，直到凌晨时分。我本来想叫醒你的，但——我习惯了自己打针。”

“你是说她又产生幻觉了吗？”

“是呀。太可怕了。她一再坚持说，有人被火烧死了。我一整晚上陪她坐着，想让她可怜的大脑能够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事实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们中间没谁知道。我不断地采用最简单的逻辑步骤，好像跟一个孩子解释一样，告诉她说学校的女生没有烧死的，也不可能有被烧死的。她说她亲眼看见房子起火，楼上窗户里冒出滚滚浓烟。她说她看见那儿有火焰，甚至还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她说她听见一个女孩子的哭喊声——也许她一时慌乱，把那跟士兵们的叫喊声弄混淆了——”威利·帕瑞戴斯看了看艾雅司，脸上终于露出精疲力竭和恐怖的神情。“跟着，她一口咬定，绝对一口咬定说，她亲眼看见一个女孩子身穿睡衣从起火的楼上窗户往下面的草坪上跳了。”

没有仆人，艾雅司只好自己做早餐了。他为自己准备了鸡蛋，在吐司上涂黄油并泡了一杯茶。寒冷的小洗涤池里，那一大堆碗碟依旧未洗。餐厅里，桌子还跟他们离开时一模一样，上面放着只吃了一部分的生日蛋糕和雪茄烟头。他一吃完早饭，就用手摸他的烟斗，然后坐下来身子往后一靠，让散发着甜香的浓烟在这一片废墟上缭绕。他穿过房间来到起居室，拾起一份一周前报道上海大罢工的过时消息的《南中国日



报》。

外面有车到达的声音把艾雅司惊醒，等他拖着身子来到起居室窗口时，只剩下一股烟尘，在早晨的阳光中懒洋洋地升起。

他发现朱莉娅坐在花园里绕着一棵胡椒树做的木椅子上，正认真地跟一个警察在交谈。当然，他是个穿着很讲究的年轻中国警察——他系着一条西方人的领带，穿了一件马甲和干净的白衬衫，膝头上端正地放着一顶圆顶硬礼帽——但他毫无疑问是个警察。他的外套叠得很整齐，放在他轿车的乘客座位上，这是一辆美国车。车子后面一辆绿色的大卡车里，两名警察面色阴沉，百无聊赖的样子，把威利·帕瑞戴斯夹在中间坐在驾驶楼里。他还穿着他那弄坏的牧师衣领，脸也没洗。他毫无表情地坐在那儿，发黑的脸和那辆卡车使艾雅司不禁想起了煤矿。片刻之后，朱莉娅意识到艾雅司的存在，便向他转过头来，她的黑发在阳光下闪着光。

“他们把威利逮捕了。”她说。

艾雅司站在原地未动，看着那个穿着讲究的警察。朱莉娅作了介绍，那个中国人坚持要跟他握手。他名叫琼尼·杨，他英语说得很好，带美国口音。

“他是根据什么罪名被逮捕的呢？”艾雅司温和地问道。

“不需要正式罪名。莫非你没听说？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已经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法了。”

突然，艾雅司发怒了。他厉声说，他的声音掩饰不住他的厌恶：“但不涉及租界。”

那个中国人和颜悦色地看了看他：“当然不会涉及租界



喽。”他朝着租界方向鞠个躬，然后继续油腔滑调地说。“不过，三江地区目前不属租界管辖范围。帕瑞戴斯牧师是因与昨夜中国人房产起火一事有关而暂被拘留的。”

警察露出微笑。

“你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暗示说，帕瑞戴斯先生故意把他自己的教会学校烧掉了么？”

“如果他烧掉的是他自己的教会学校，那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根据总司令蒋介石将军发布的命令，外国人开办的所有教会学校必须由中国人任校长，这所教会学校现已没收为中国财产。”

艾雅司沉默不响。他看了看那警察，然后问：“你们要拘留他多久？”

“调查事实真相需要多久，就拘留多久。”

朱莉娅轻声说：“威利要呆几天了，我想。”她站在那儿傻乎乎地微笑着，身穿她星期天穿的那件连衣裙。接着她往下看着，用手扯了扯她手套中的指头。

琼尼·杨又转身对艾雅司说：“大夫，你准备以正式身份住在这儿吗？”

艾雅司慢慢地说，他害怕表现出愤怒来：“我是作为帕瑞戴斯牧师和朱莉娅·帕瑞戴斯的客人留下来的。”

警察似乎感到满意：“那好。”他朝他的车子走去。“现在你就作为中国人民的客人留下来吧。我相信，你会尽最大的力量保护中国人民的财产不再受那些尚不知道的个人或人群的损失的。”他戴上他的圆顶硬礼帽，把双人座敞篷汽车的门打开。这时，朱莉娅走上前来，摸了一下闪光的绿色挡泥板。



“这车开得快吗？”她抚摸着车身上的油漆，讨好地问道。

“很快，”那人向她保证，又把帽子取下来，仔细地着她的脸。“但我本人开车很慢，很小心。”他微笑道，相当装模作样地向前半鞠了一个躬，也许是在嘲笑西方人关于东方礼仪的形象吧。“这是我父亲送我的礼物。是婚礼。”他微微地扮了一个鬼脸，露出整齐的白牙。

“你父亲能这样天女散花地给孩子送礼物，肯定很有钱。”

“就一件礼物，谈不上是天女散花。”他往艾雅司那儿看了一眼，后者正注视着朱莉娅。她脸红了起来，女教师的小嘴紧紧地闭着。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琼尼·杨的眼睛。难怪他感到难为情。在这样的盯视下，他不可能报以礼貌的反应。她真的是在审视他，仿佛他是个罕见的人，一个怪人；他皮肤呈菜色，平滑而干燥，鼻子扁平，脸上看起来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条接缝或结合部位，顶上是一头浓黑的擦了润发油的头发。

这时朱莉娅说：“他没做错什么，你知道。他不了解政治。”

警察现在明白了。他边往车里钻边说：“你别担心。我们会跟你联系的。也许明天吧。”

“来喝茶。”朱莉娅平板地说着，他发动了车。跟着，车开走了，那辆卡车隔着一段距离跟在后面。威利·帕瑞戴斯这个甘心情愿做烈士的人，穿着他那件领子端部已弄黑的上衣，仍不失尊严地沉默地坐在那儿。

车绕过车道拐弯的地方时，艾雅司看见格蒂尔德·普拉兹身着裤子，戴着一顶男式宽冠帽直起了身子。她目送那辆双座敞篷车和卡车从视线内消失，然后回头给玫瑰花剪枝。



朱莉娅又穿上了那件旧羊毛衫，一支接一支地吸香烟。艾雅司听见从房里某个地方传来音乐声，他想可能是在楼上，是一架留声机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同一首美国爵士乐曲。他觉得格蒂尔德·普拉兹极不可能放这种音乐。

朱莉娅说话时脸部挤做一团。她好像没有注意到音乐声。她还在以过去那种强烈的情绪谈到她的童年。她说的话开始变得含混不清，一句话说到中间就要喘口气，话都像含着毒液一样一小段一小段地迸溅出来。她不时停下来，发出一种松垮垮的，好像往里吮吸的声音，因为唾液聚集在她的嘴巴周围。“威利到大陆饭店来的第一个晚上，不过是个来付钱，摆脱他多余液体的穿西装的男人罢了。”她突然显得比她31岁的年龄大得多了。她的眼睛显得很坦诚。

沉默片刻之后，她又继续讲下去，声音很丑陋：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我看见一个男人沿着外面的阳台追赶一个女孩子。她吓坏了。我跑到门边，但她已经到了走廊尽头，那男的几乎追上她了。这时，她一转身就跳了楼。我从楼梯扶手往下看时，只见她白色的睡衣铺展在下面路上。”

小爪子般的皱纹悄悄爬到了她的嘴巴周围，她从下午起就把嘴唇涂得惊人的红艳。

“蒂娜·特莉娜伸出粗大的膀子搂住我，不让我下去看。我们在她床上哭了一整夜。直到现在我都还能感到她的大乳房在她的睡衣里颤动。”

朱莉娅关于过去的幻象继续往外倾泄。一切都执拗地、违反常态地遭到失败，无法证实艾雅司在他诊断笔记中搜集的弗洛伊德“病例”的基本要点。至于他们每星期二的会面，



她不容许提问或要求澄清问题而把她的谈话打断。

一次，她突然在椅子上转过身来，拧亮落地灯，从地板上捡起一个平纸盒子，把盒盖打开。与此同时她不停地谈着话，开始在里面几打照片中翻找起来。艾雅司注视着她，预感到她可能要给他看她的“夜间照片”了。

外面天黑了，艾雅司急着要走。她不会开车，即使他能开车到火车站，也不能保证火车是否没有延迟或甚至取消了。他觉得好像掉入了陷阱。他想要那个女人别再讲下去了，因为她跟他讲的都是些他并不想听的事，但好像他身体有某个部分跟艾雅司坐在那间房里，却又不属于他，他大脑中那个冷酷的部分继续躲在他跳动的肝脏后面听着。他身上那个科学的部分激动异常，以致他一言不发，坐着注视她抖着手又点燃了一支烟。

他椅子旁边的桌上，敞开放着那个装照片的平纸盒子。这些照片的确是她在上海中国人居住区照的“夜间照片”：一个断腿的乞丐坐在银行门口外面的人行道上；扁担两头挑着大包东西的苦力佝偻着腰；年龄不足十二三岁的雏妓把裙子提起来暴露她们的身体，时装模特儿样的身段之上，饥饿的眼睛显得奇形怪状；一个戴口罩的男子，他后面敞开车箱的卡车上堆满了尸体。有些照片是在喝早茶的茶馆和市场周围照的，没有一张在警察验尸官的报告中会显得不合时宜。但他盯着看的照片上的主题却十分生动：一个无家可归的妓女，闪光的头发盘在头顶，衬衣敞开，露出里面尚未成形的乳房，她那张化了妆的早熟的脸朝照相机顶过来，好像她认出了镜头中或镜头背后某个人的形象。这个姑娘名叫露西，摩根·麦卡



弗瑞雇她做过两次模特儿，艾雅司偶尔也使用过她。

这时，朱莉娅讲得急切起来，在艾雅司看来，她很显然是在向他交代一切，因为她感到她可能没有时间了。那天下午，她充满了故事，既具体，又详细，仿佛都是实际发生过的，她成了她自己虚构故事中的牺牲品了。“我起先没意识到那是露西，因为她脸上化了妆。我只见过她穿蓝校服的样子。中间隔了六个月。就连她家里的人也以为她死了。我原来很喜欢那个女孩的。她一直是个很特别的女孩子，跟别人不同。我记得她第一次到我这儿来，背诵：

在离宫里，忽必烈

命令建造一座巍峨的大厦……”

突然，朱莉娅抬头看他一眼说：“你杀死了她，艾雅司。”

那孩子的脸从照片上回望着他。门开了，名叫摩根的画家仍旧站在画架边。艾雅司可以看见那女孩站在他的左肩后面。听见关门声时，她转身沉默而有力地盯了他一眼，头向前探出，赤条条的身体似乎失去了平衡。摩根蓄着胡子，头发乱蓬蓬的，穿着蓝布苦力棉袄，看上去几乎不像欧洲人，艾雅司闯进来时他也没动一下。他无动于衷地站在那儿，他的画笔精典地，几乎是装模作样地竖在空中。他表情严峻，他的络腮胡子覆盖了嘴巴，也覆盖了任何可能流露的情感。只有一对眼睛是清澈，蓝色，开朗，差不多是透明的，使他身上有一种盲人能够穿透一切的表情。他最后开口说话时，声音显得顽皮，



好像被逗乐似的，跟那一部粗野外露的络腮胡子很不相称。他用他那种慢腾腾，好像被逗乐似的声音说：“嗯，看我。看是不是小露西的医生朋友到这儿来了。他究竟想要干吗？”

“我想要你给我看那张画。”艾雅司说。

露西的黑眼睛往艾雅司那儿看去，跟着环视房间，不肯接触他的凝视目光。这是一间很大的粉刷过的房间，地面铺了石头。房间像野人一样光秃秃的：没有蹭脚垫，没有地毯，没有取暖炉子，模特儿冷得发抖。只有四面墙上挂满了摩根的画，有的画在纸上，有的画在硬纸板上，三层板上，茶盒子的边上。房中央他站的地方是那个临时拼凑的画架子，小工作桌，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艾雅司环视四周，看着钉在墙上的十到十二幅作品——茶馆风景，湖滨风景，河渠中漂动的小船，身体奇大乳房像鸡蛋样的当地女人在海里洗澡。

画家注视着他，他蓝色的眼睛依然微笑着。“嗯，小姐，”他说，“嗯，小露西。我们最好了解一下，看小露西的朋友医生要干吗。你想知道他要干吗，对不对，小姐？”

她呜咽了一声，狠狠地盯着摩根：十分紧张，弱不禁风的身体不停地扭动着，黑眼睛闪着光，宛如一头很小的森林野兽，准备钻出藏匿的地方逃走。他同情地大笑并扳住艾雅司的肩头说：“来呀，小露西的朋友。到暖和的地方来。我们可不想把你的坏大熊掌累坏，对不对？”

他把门打开，通向另一个房间。女孩子迟疑了一下，便在他的膀子搂抱下惊惶地跑走了。他把他那间冰冷画室的门在身后关上。他们现在到了一间更小的房间，跟前一间一样几乎也是光秃秃的，但从正方形的瓷炉子里发出的暖气和卷起



的床垫使人觉得这间房不那么荒凉。北方凄凉的光线从高处一扇小窗中射入房间,照出靠墙放的一幅大画。这张画是在帆布上画的,还用画框子撑着:画面上是那位 12 岁少女的裸体。艾雅司对这冷酷的现实主义没有思想准备,那女孩平坦的胸脯上乳头几乎没有形成,腹部形状还带有童稚,这跟她的阴毛一样让人吃惊。她萎靡不振、倦怠无力的肉体曲线中清楚地传达出一个信息,她那一头平直的黑蓝色头发垂下来,仿佛被汗水湿透,背景中那团弄得乱七八糟的床垫,现在已卷起来靠墙放着:摩根在画中抓住了一个男人欲望消退时所感到的忧伤,这是一种没有得到完全满足的欲望,同时在那女孩的脸上抓住了由于不断被强奸而引起的失望。艾雅司等待着注视小露西的反应,但她没有反应。这时,他把她向前按下去顶住墙,动作突如其来,力量很大,使她大叫了一声。他摸索着解裤子扣子时,他感到忧伤和怜悯从脖子上突露出来。

现在在另一个国家,除此之外,那妞也已死了,他想。当一个女孩子在大街上死去时,子宫破裂和直肠穿孔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市政厅来的戴着口罩的男人和车箱敞开的卡车不会停下来去弄个明白的。或许她是由一个穿着旧雨衣,围着围巾,拎着照相机,在夜晚街头游荡的妇人从阴沟里扶起来,然后带到教会医院在十字架下等死的。此时,他坐在朱莉娅的起居室里,沉重的时刻一分钟一分钟滴滴答答地从他神经中穿过,除了等待朱莉娅告诉他外,没有别的办法。

他愿意长久地重新体验她在教会学校那个房间里所讲的



一切。他常常回忆起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粗的样子，她的脑袋因说话精疲力竭而垂向一边，他第二次不得不亲自面对那个死去的孩子的照片时，朱莉娅抬起头来说：“我上你床的第一个星期二，我就想知道什么样的人做得出这种事来。”

正如一秘杰拉尔德·柯尔在长酒吧里对艾雅司所指出的那样，威利·帕瑞戴斯是一条在危险的海水里游泳的小鱼。他想看看怎么办，但在每一艘英、美舰艇都被用来防止国民党军队进入租界的情况下，提交一份外交照会除了让某个中国佬笑话，又有什么意义呢？威利·帕瑞戴斯就这样消失了。

几个月后，艾雅司造访了上海市郊国民党秘密警察总部所在地的那座大楼。这是一座废弃的阴森森的屋子，在高高的石墙后面有一座荒草丛生的花园。他透过空荡荡的门窗往里瞧着。根本没什么可看的，当然不会看到威利的鬼魂，就算威利曾被带到那儿去过。地下室里有几个房间，但没有血，也没有人的粪便，看不出这些房间是干吗用的。他爬上摇摇欲坠的楼梯，来到屋顶室，窗户俯瞰着后花园，里面也长满了荒草。他看见那堵有三块白斑的砖墙，有白斑的地方砖和水泥都被削掉了。他走下楼梯，来到阳光地里，想看个究竟。

三块白斑是子弹打出来的。他可以看出囚犯站过的地方，每次三人，面壁而立。然后是子弹声。墙上的弹洞很深：这一过程重复了成百上千次。他费力地走到行刑者可能站的地方。野草丛中散乱着成百上千个弹匣。黄铜弹匣在阳光中闪耀着光。

艾雅司环视着周围。墙后有电线杆，一道普通的苦顶竹



编花园栅栏,以及一幢幢的房顶。清晨的各种噪声飘进这座废弃的花园,那是日常充满欢乐的邻居的说话声,车声和公鸡打鸣声。花园另一边完美而平凡的清晨使他心痛。他意识到,他对中国差不多就跟他对生活一样痛恨。上海毕竟只是他绕道而行的中间一站,他从来都没打算在此停留下去。多年来,他就蛰居在这个肮脏的逗留之地。他的家仍在饭店。他感到他在这个世界差不多已经生活了 35 年,但却什么都不明白。而且还有:他感到他到底还是没能明白朱莉娅·帕瑞戴斯送给他那件礼物的重要性。

她像一个色彩绚丽的拼板玩具被拆散开来,在他大脑的地板上散了一地。他的思绪继续生活在她生活中的各个小部分中——或者说他越来越觉得是她的“多重生活”中。他大声对她说话,恳求她澄清某个要点,解释这一句话和那句话之间明显的矛盾之处,以便理解他演了一遍又一遍的那场野蛮的哑剧。简言之,他着魔了。

甚至他的大师都不鼓励他。弗洛伊德本人写道:“我自己都仍然觉得奇怪,我所写的病史读起来居然像短篇小说……”他在自己 1919 年的授课笔记中说,“心理分析从本质上来说是通过爱情达到治疗。”艾雅司想起了他自己在爱情上的无能。难道他渴望做到的顶多是无能为力地偷窥女性茂盛葱茏的内心世界吗?他觉得他所接受的训练,以及他的科学方法都失败了。

他似乎永远饥饿,即使饱餐之后也是这样。但他的饥饿是一种躁动不安的感觉,汹涌地穿过他的每一根神经,结果到了夜间,他不得不走到户外,在大街小巷散步,他发现他的脚



步总是引向同一个方向……没有别的，只有跟着她追逐那些女孩子幽灵般细瘦的身影，她们不是公然地露出涂脂抹粉的微笑向他转过身来，就是逃离他，沿着没有灯光的大街跑下去。他回忆起她“讲述”的某些部分时，禁不住浑身发抖，他突然产生了强烈的欲望，想沿着涌泉路走下去，找一个这样的女人，她也许会把他再次领入神秘之中，那儿河水拍岸，鸚鵡尖叫，尤加利树浓香刺鼻。但无论他多么经常地占有她们小小的肉体，他都被排斥在鸭河的世界之外。

他找到曾在长酒吧喝酒的那位澳大利亚驻外记者。“鸭河，你说——”那人狠狠地回看了艾雅司一眼，然后摇摇头。“对不起，老头子。”

次年，她好像从天而降，给他往阿斯顿王朝饭店打了一个电话。她来看他好吗？当天下午行吗？下午五点在四川路邮局门口行吗？

艾雅司四点不到就提前离开了饭店。外面是夏日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海风温柔可爱。四川路上停了几辆人力车，但他决定走路去。想起又要见到朱莉娅，他感到刺激。他突然觉得幸福了，他意识到原来他一直有意不去想她。他到那儿时邮局的钟正好敲响五点。

朱莉娅已经等在那儿了。他几乎认不出她来。她样子好看多了。她的眼睛依然有着习惯使用麻醉剂的人那种过度疲劳的神情，但现在，他在阳光下看见，她因涂睫毛油，打眼圈粉而夸张了这种效果。她抹了唇膏，双颊显得很健康，艳若鲜花。艾雅司一眼就可看出，她现在已不再那样过分依赖吗啡



了。

但天气晴朗、燥热，她却穿了一件厚重的大衣，头发上扎了同样一条丝织围巾。“没有威利的消息吗？”艾雅司立刻就问她。她回看他一眼，几乎没听懂他说什么。他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带她上德尔摩里柯餐馆去吃饭。

他们到了餐馆里面时，朱莉娅脱去她的大衣和围巾。他吃惊地看见她穿得很时髦。裙子长仅及膝，无袖紧身围腰深深地扣在腰际。她脖子上戴了一长串珍珠项链。头发也新近剪过，是新式美国短发式样，引得别桌的欧洲人都回头看她。

“我需要钱用。”他一订好菜，她马上就说。

“我很吃惊你没早点跟我要。”她眼睛看着别处。“要多少？”他问。

“很多。”

“很多是多少？10英镑？20英镑？”

“我需要165英镑。”她严肃地说。

“我不可能一下子就去弄到那么大一笔款子。”

“你没这钱吗？”她声音里有种戏弄的调子，那是敲诈者惯用的讽刺和自我作贱的口吻。

“我当然有这钱呐。只不过我需要一两天才能拿到手。我得到我银行开张支票才行。”艾雅司知道，他明天早上十点钟到他银行去就可以取到现金，但他需要时间决定她是否真的需要这笔钱，而且他是否需要把钱给她。他说：“你没怀孕吧？”

“没怀孕。”

“跟政治有关吗？”



她摇摇头。

“你现在住哪？”

“住在租界。等会我把地址给你。”

“你跟朋友住在一起吗？”

“不，”她平静地说。“我住在供膳食的寄宿所里。”

他看了看她那双围了一圈黑边的疲倦的眼睛，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那你在哪儿弄到吗啡的呢？”

“我没事。”片刻之后，她补充道，“谢谢你。”

“这个供膳食的寄宿所。这地方我去造访可以吗？”她的眼睛流泪了，双颊突然红了起来，好像被人打了一巴掌。她没回答，因此他说，“你为什么要钱用？”

她开始说起话来，跟着吸了一小口气，用一种平静而庄严的声音说：“我们要出国了。我们要到德国去住了。”

“我们？一个男人吗？”

她摇了摇她剃过的头，平静地说：“我不打算在这个国家长期住下去了。一个男人跟我们安排坐班船于本月底离开。但我得弄 165 英镑付他。”她看着桌面把这些话说了出来，用手摸着碟子，茶壶，放在她面前盘子上的那块只吃了一半的蛋糕。她抬头看了一眼，迅速地说：“我能抽支烟吗？”

她问话的纯朴样子感动了他，他举起手来召唤侍者。这是他知道他会借钱给她了。她说：“最后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一下。我想要你去看格蒂……”

她给他的地址是美国租界一座失修的两层楼房。事实上它就在四川路上，正在他头天下午跟朱莉娅碰面的邮局对面。



她们的房间在楼上，下面是一家妓院。前面那座小花园长满荒草，前门口的大部分拼花地板由于无人管理而破损。前门开着，他顺过道往前走时，左面一扇门开了，一个男人看他一眼，这是一个年约 40，面带微笑的中国人，头发上抹了发油，穿了件肮脏的无领衬衣，领口是开着的。

她们的房间惊人的宽敞。一扇窗户俯瞰着苏州河。格蒂尔德·普拉兹单独接见了她。通向卧室的门关上了，他不知道朱莉娅是否在里面。他以前对这个德国女人的印象由于她穿的衣服而更加强了：同一件黑暗的，没有形状的呢子西装，不过他注意到，那几个银十字架已经不见了。他看见她的头发也像朱莉娅的一样剪得很短。她微笑着跟他握手。她在窗边摆了一张矮茶桌，上面铺了一袭织花台布，她的书本，笔记本和笔都摊开放在上边，围桌摆了两张藤椅，上面放了几只软靠垫。窗槛上有几小钵植物向着光线生长着。这房间有着修道院那种清峻的感觉，她还在墙上挂了她的廉价的三圣人平版招贴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

她用她那低沉，圆润的声音说：“恐怕我也不知道该从哪儿讲起。事实是，我们对你不那么诚实。”

他坐在一张藤椅里，从他外套的兜里取出装着 165 英镑的那个棕色信封，把它放在她面前的桌上。她往下看了一眼那信封，即使感到满意，也没有流露出来。接着，她把信封的耳朵打开，他本来就没有封口，然后点起那一扎十镑和五镑一张钞票的数来。

“请原谅我，”她说，“这很重要。我想你过的生活不会娇生惯养到没听说他们在这儿对共产党所做的事情吧？”



他看了看她桌上放的几本合上的书和小册子的标题：《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要改革还是要革命？》，《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德语：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译注），《进一步，退两步》，以及一本翻破了的德语版的《资本论》。他往下看了一眼她那本日记打开的书页上写了一半的密如蛛网的黑色笔迹。他在捉摸，不知威利关于太平洋中珊瑚繁殖的那篇论文下落怎么样了……

“你知道 Heizer 这个词吗？”他问她。

她钞票点了一半，抬头看了一眼，脸上出现震惊的神情：“朱莉娅把这个告诉你了？”

他点点头。

艾雅司认识她以来，这是头一次看见她发窘了。“这是个私人的词汇。我怎么说呢——‘制造火焰的人？’”她用手背轻轻扫了一下，示意她的下体。“我还以为你知道我跟朱莉娅的事呢，明白吗。我还以为我们去杭州前你就知道我俩的事情了。是呀，杭州，”她微笑道，“那儿的山，那儿的湖。但我们到那儿去不是为了呼吸空气。我们去是为了听迈克尔·鲍罗廷在同志会上讲话。”

“那那一场火呢？”

她看了他一会儿，好像没听明白。“你是奉命而来的？”艾雅司追问她道，“那些士兵是为了破坏罢工队伍而回来的。”

她平静地说：“不是的，这事不是我策划的，如果你说的是这个意思的话。我不能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自发地燃烧。”艾雅司冷笑道。

“自发。你们这些弗洛伊德学派的人用这个词比我们还



不舒服。咱们就把它称做‘婴儿紊乱症’吧。你知道列宁吗？”

“不知道。”他说。

“真可羞呀。你应该看看他的书。”她更加欢快地继续说，“也不妨让你知道一下，她告诉帕瑞戴斯了。不仅讲了我们的事，而且也讲了你的事。”

“起火的那天晚上？”

女人简短地点点头；只点了一下。

“她也应该选个更好的时候嘛！”

“她想尽可能不伤害他。但你到这儿来不是要跟我争论谁是谁非的。我要你来是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

“如果你还要钱的话——”

女人把手举起来：“不，不。我想请你就一件医学方面的事情提供咨询。”

“检查吗？”

“正是这样。”她狞笑着点点头，说完话后还继续地点着头，好像是在推迟她下一个行动的时刻。跟着，她站起来，开始解衬衣扣子。她的皮肤病的伤痕在窗边的亮光中清晰地显露出来。她的皮肤在左乳和腋下沿胃部一边之间的地方褪色了。皮肤在有些地方是一块块的深棕色，而在其他地方则呈狮皮一样的黄色或茶色。皮肤肿起的瘤子和疤痕在腋窝附近出现。

“韩森病，”艾雅司说，“即麻风病。”

她对他回报了一个点头，带着同样讽刺的微笑。

艾雅司说：“你接受治疗了吗？韩森病有轻度传染特征。”

“那治疗呢？”



“隔离起来。有专为此目的而建的麻风村。”

“那药呢？”

“过去用过大风子油。如今很多人都对其价值提出质疑。”

“能活多久？”

“10年。如果不出现继发感染，可能还会久一些。”

“朱莉娅也会得这个病吗？”

他审慎地看了她一下：“她也会得的。”

“那就隔离起来好了，”她点点头说。她把衬衣扣子扣上，又坐了下来。“我在德国的政治工作得放一放了。”她坐着看了一会儿窗外苏州河上成百上千只舢板船成各种角度挤在明亮的草黄色水面上。“澳大利亚有麻风村吗？”她问。

“我的好女人，我连澳大利亚在哪儿都不知道。”

她对他露出微笑。

“噢，是呀，”她说，“朱莉娅要把这些东西送给你。”她把手伸到桌子下面的地板上，把装着相片的纸板盒交给了他。

“朱莉娅真的好多了。还在吃吗啡，但我希望慢慢地让她把吗啡戒掉。事实是，她来见你的时候已经碎成片片了。她现在强壮了，真的强壮了。她的意志力很强。”她又露出那同一种知道内幕的人的微笑。艾雅司往她脸上看了一眼，后来，他总是觉得，他当时看的是一张未来的脸，一张20世纪的脸。

艾雅司后来在中国的20年中多次看见那张自信的脸。他在参加斗争的农民，工人和士兵的脸中看见过她。他老年时，在宁静的清晨，在爱丁堡普林塞斯大街公寓，他也常回想



起那张脸,并将所发生的一切,他驾着改装成救护车的那辆老式贝得福得卡车,随临时野战医院转战南北时所见到的一切都归功于那张脸。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在那年剩余的时间里,他像以往一样不问世事,这一年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清洗从上海蔓延到保守的司令官所管辖的其他地区,鲍罗廷以及其他俄国顾问被打发回莫斯科去了。他在《南中国日报》里读到有关搜捕中共党员并在有着电线杆子,鸡窝,玩耍的孩子发出欢呼,花园砖墙上有一块块弹痕的普通小镇上和普通花园里处决他们的消息时依然能够保持无动于衷的态度……

他发现他越来越多地吸食鸦片了,有时一夜要吸六到七杆。但吸鸦片带来的松弛感并没产生宜人的梦境,却带来一种强大而清晰的想像力,使他又一次寓于朱莉娅的那个“区域”。无论吸食多少毒品,都不能缓解他心脏跳动的那种紧张而不愉快的感觉。

第二年情况依旧,国民党的军队向北挺进,挑动老百姓与教堂、教会医院和学校作对,上海市内的墙壁都贴上了宣传标语,就跟朱莉娅“童年生活”中的事情一样怪异:

外国鬼子崇拜猪猡。打外国鬼子,烧他们的书。这些人像猪一样打着哼哼,把胎儿夺走。对基督的可怕的惩罚,猪的化身。只有亲眼看见在黑暗的十八层地狱里用锯子锯,棒锤捣,大锅煮,磨石磨,外国鬼子才知道厉害。你们在这个世界犯了千罪万罪,



阉割了男孩,从孕妇肚中夺走婴儿,剜男人眼睛,割女人乳头……我们用万箭穿透猪猡的身体之后,妖怪还敢再发出哼哼声来吗?

艾雅司起初对沈阳事件和日本入侵东三省以及那儿发生的惨案无动于衷。这一切的存在都是为了填充《南中国日报》和《上海晚报》的版面,在报上艾雅司看见一条新闻说,蒋介石总司令现已跟宋氏三姐妹之一结婚并成了卫理公会教徒。

在租界区的上海俱乐部内,生活跟从前没有两样。生意人对世界萧条也许比以前要敏感一些,英国人的老婆们继续疲倦地渴望回家,她们的女儿继续在殖民地公务部门寻找她们的靶子,当神枪手也没击中靶子时,就暂时发一阵歇斯底里,或者堕入一种深度的不适状态。对于艾雅司来说,生意总算要比平时稍好一些。

他发现他依然热衷于“偷听”女性的隐私。在催眠状态下说的某句话或某个字会以过去的方式刺激他的想像力……但什么也没有。他对他的病人更加严厉,也更加爱说讽刺话了。他对他的职业,对全部的科学心理分析法,都已失去了信心。

他依然在每天下午早些时候去长酒吧,又在吃过午饭后回到楼上的阅览室里抽烟,那是这个神经紧张的城市中一个妙不可言的安静而满足的茧壳。在那儿,倒上另一杯白兰地时,身穿铜扣子制服的“侍者”就会本能地出现,那儿有深深的皮扶手椅,绿罩台灯,空气柔软而刺激,带有雪茄烟香,可以很安全地指望在那儿碰到持有很舒适见解的人。



艾雅司就是在百叶窗关住了亮光的安静的阴暗处，深深地陷在椅子上时，偷听到一个刚从满洲里回来的英国海军司令跟另一个人说：“战争绝对是件坏事。”艾雅司把呵欠憋住没打出来，又看起了他的报纸。

“特别是有一件事……日本鬼子把所有的中国儿童都赶进一个村庄，统统地刺破他们的耳鼓……”

艾雅司听见他说的这些话，就像在一个可憎的百年中会说的其他的话一样。这一时刻过去了，海军司令走了。很快，回家的时候就要到了。

但这件虽然简单但却恐怖的事情却在艾雅司脑中萦绕不去，他坐出租车回阿斯特饭店的路上，想像中仍然出现军装和日本军官的军帽，上好的刺刀和小捆细竹签子的画面——突然，他的面颊湿润了，他感到呼吸困难。他掏出他的印花大手帕，把脸蒙起来，将汗水从胡须尖上揩去，环视了一下四周。司机并没有注意。

那天晚上，他在阿斯特饭店的房中把一直放在碗橱中的朱莉娅装相片的盒子打开来。他在中间找了一番，最后找到一张面孔。那双眼睛率直地，甚至好奇地回看着他，但却没有谴责的意味。他认出了照相的那条大街。还是那条街。他有时到那条街去散步。它上面仍有小女士出没，它跟苏州河里的舢板，地平线上飞的白鹤，更远一些在锚地浮动的船舶一样，也是上海市的一个部分。他回忆起 1922 年下船后无名而自由地溶进城市的那第一个早晨。此时，相片里的这张脸越过历史，一眼就认出了他。

那个月，也就是 1932 年 2 月下旬，日本人轰炸了上海市



的中国居民区,街角都竖起了带铁丝网的路障。3月份,签订了一项在上海周围停火的协定,但艾雅司已经作出了决定。他从前曾把药物当作一种逃避手段,现在再这样做又何尝不可呢?就在这同一个月,他把事情整理好,离开了他在阿斯特王朝饭店的那几间房。他坐火车去了北京,蜷缩在没有毯子的三等舱里,这对一个欧洲人来说几乎闻所未闻。

他在老鞑靼城郊把一处中国人仆人住的院子租了下来,就在那人喊马嘶,家人吵架的嘈杂声中开始行医。他用捡来的破床垫做床,他的手术台是用厨房用品改装的。他借当地主教和英国女人的帮助,弄来了药品和其他医疗设备,他们的团体跟驻在上海的国际红十字会有联系。凡是能弄到手的材料,他都凑合着使用,但鸦片总是有的。他只对付得起费用的人收费:他父亲有一笔遗产存在他上海的银行里,他想办法还是能够对付下来。每逢星期天,他就把救护包里的物件装进一只帆布背包里,走很远的路到城墙外,沿着河渠朝山城走去,凡有需要他的地方就地停下来,越来越深入乡间……

骆驼在北京那个地区依然很常见,他产生了一个想法,想骑骆驼进入内地,但在主教的帮助下,他弄到了一辆贝得福得卡车,他用三合板把它改装成一辆救护车。他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学习驾驶——他以前连小汽车都没开过——他成了人们逗乐的对象,练习开车时还引起了不小的惊恐,换档换得吱嘎作响,瞎按喇叭,把车倒着开上了城墙外的灰土路上,小个子英国主教坐在他旁边的乘客座位上跳上跳下的,催促他往前开。



他一连串缓慢而迂回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他穿过了中国北部许多地区，在他卡车的后面或医院帐篷里照料病人，这种帐篷医院在比较孤立的小镇有时一扎就是几个星期。中国人说，鬼走路走直线，但艾雅司走的路线交叉分岔，迂回重迭，如果在地图上表示，肯定会在中国北部编成一只猫篮的形状。他只是为了计算去各城镇的距离，以便算出汽油时才查看地图，每隔几个月，他都会去北京补充药物，装满他的 15 个燃油罐，储存食物和烟草。但他旅行一般都不需要地图，而是根据道听途说判断哪儿需要他。

他的名声开始传遍广大北部地区，但不像中国人崇拜的那些外国人用的是一连串音节——李提摩泰或马立孙。人们简单地称他为艾雅司——“艾司”，他们这样叫他。“艾雅司下周到这儿来”，或者“他们说艾雅司现在河南，那儿爆发了天花。”

有时，他在其他自愿人员的护送下旅行。而在其他时候，由于车轴折断或洪水堵塞而陷在路上，他十分孤独，竟然听见自己在跟一个蜘蛛讲话，那蜘蛛就生活在挡风玻璃一角的一个蜘蛛网中。

他的胡须过早地发白了。他开始戴起了一副细杆金丝眼镜，一顶有防冻耳盖的飞行员皮帽，一件苦力棉袄……，渐渐的，他能够讲各地方言了。

共产党完成了去陕北的长征。艾雅司在那儿呆了一段时间。他穿过日占区的满洲里。1937 年，战争真的打起来了，他随前线转战南北，他的卡车四边和顶上都有正式的红十字会标志。有几次，他遭遇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子弹把胶合板都



打碎了。

日本军进攻上海之后,又从海、陆、空三面西进。艾雅司亲眼看见一群群老百姓被绑在一起,被日本人用机枪扫射取乐。他亲眼目睹了对妇女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人占领一个城镇时,就连小孩或老人都不放过,无情地用刺刀把他们挑死。

奇怪的是,日本人对艾雅司毫无兴趣。在一个小镇里,他坐在一堵墙上抽烟,子弹就在他周围开花。从某种真实的意义上来说,他“出生入死”。他以蛮勇的行为主动找死,因为他一心想死。但在那个时候,艾雅司的困境在于,他已被判永生不死……他跟红十字会那群成分复杂的人一起,随前线队伍来到湘江流域,长江以北,山西,黄河以西,以及湖南西部的群山之中。

在那年头中国永不停息的战争中,他在瘟疫、饥荒和污秽中看见格蒂尔德的脸,他在万人坑连艾雅司自己都得戴口罩的地方看见了格蒂尔德的脸,他在吞噬了小女孩的被围困的城市看见了格蒂尔德的脸,他还在因救济粮食到达而发生骚乱和践踏的地方看见了格蒂尔德的脸。

解放战争期间在徐州,他来到一家医院,该院所有的病人都已死亡。医院人员撤退时,他们留在病床上而饿死。那座建筑物冷冷清清,寂静无声,就在那一个时刻,他也想起了她的脸。

最后,他欢迎红军的胜利,不为别的,而仅仅是因为它会结束苦难。同样,他责怪的并不是她的政治,而是她那张脸。

战争使艾雅司对食物失去了兴趣,他甚至还用烟斗抽起



了地方上的粗烟叶子。他短时间回到上海时,就把他从英国外交官那儿弄来的装着奢侈的加拉赫蜜瓜的罐子储存起来。那段时期他一直单身,尽管他曾跟一个信基督教的中国护士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人名字难以置信,叫弗洛仁丝,他私下爱着她。1949年,在风平浪静的那个月里,他乘坐“布瓦塞温”号豪华荷兰客轮离开了中国,跟一群中国富人,犹太人,白俄,拉皮条的,歹徒和菲律宾舞蹈团一起挤在海关棚子里。最后,他回到了他的出生地,退休后住在他在普林塞斯大街的公寓里。

在这一切中的某个地方朱莉娅失踪了。他回上海时收到过她几封来信。也许阿斯特王朝饭店仍有信在往中国某个地方转。她每封信都很热情地称呼他,描绘她在澳大利亚乡间教区当女教师的乏味生活。艾雅司根本不知道她干吗还写信,因为她没有任何东西要告诉他,即使有,她也没有写进信中。这正是那种一般人写往一个远房有钱叔叔的信,毫不令人信服。这些信跟她与约阿契姆从粗声大嗓的河鸟群中漂过,蕨类植物长了眼睛,而且会动的那个遥远的时代毫无联系。但他继续在那只船中漂着,陷入她的经历之中而不能自拔。一旦被引入那个含有恶意的动物幻想症的宇宙中,艾雅司就再也逃不走了。他执拗地认为,如果他能够足够深入地读懂这些干巴巴的信件字里行间的内容,他就会发现那些神秘的动物依然潜伏在某个地方。从某种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他从没越过她引领他的第一个星期二。森林早已在他面前展开,把天空挤了出去,密匝匝的青枝和藤蔓刮擦着小船,鸭河的河面被亮绿色植被的浮垢燃亮。他现在发现她目前的世界



相当不现实,这难道有那么让人吃惊吗?朱莉娅魔术般的神经机能症始终是个秘密。他自己说过的话又回到耳边。“东方……解决办法有时简单到买一张回家的船票就行……”

就像在生活中一样,那些神秘的事情始终悬而未决,进入了地下,只在他的梦境中绘制出来。艾雅司再也没听说过摩根·麦卡弗瑞了。他偶尔想入非非,打算移民澳大利亚,但他把这个想法放逐到想像的领域,神话的境地。他知道,如果他真的发现真实的曼姆,如果曼姆存在的话,他会失望的。他在爱丁堡的大学图书馆查找过地图,但却没有结果。

慢慢的,就连中国也消失了,尽管鸭河这两个字在 1950 年让那个嚼口香糖的护士莫名其妙,她听见他临终时喃喃地说出了这两个字。死之前,艾雅司开始做起了关于森林之火的梦,他梦见少女穿着白色睡衣从燃烧的窗口往外跳。他梦见的不是但丁的地狱。他置身于一个干燥的泥色的国家,到处是尤加利树。朱莉娅就在那儿。还有格蒂。那些巨树中的每一棵都大声叹息着,变成一个个火把,宛如夜间的灯塔。

98.8.31 译完

98.9.20 改

98.9.25 再改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心理医生和他的女病人

作者 = (澳) 罗德 · 琼斯著

页数 = 9 6

S S 号 = 1 2 2 5 3 3 0 4

出版日期 = 1 9 9 9 . 0 8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